桓仁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政协辽宁省桓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5·12

目　录

《桓仁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序　　言

中共桓仁县委副书记　**庄振文**

《桓仁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和大家见面了。

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是周总理生前所倡导的。它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代意义深远的重要工作。

桓仁位于辽宁的东部山区，山水秀丽，资源丰富。勤劳勇敢的桓仁县各族人民，为了建设美丽的家乡，保卫祖国的这块土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创立了光辉的业绩，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水侵华，东北沦陷，桓仁山川烽火起，江河流血泪，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日伪的统治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榨着劳动人民的血汗；派劳工，抓壮丁，开矿山，修铁路，劳动人民当牛做马，侵略者疯狂地掠

夺中国的财富；五里甸子的人头添斗，华尖子的万人坑，在教育界抓思想犯，惨绝人寰的西江惨案，记载着桓仁各族人民的血海深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感召下，五女山下怒火燃烧，浑江两岸风云呼啸，桓仁的人民大众，英雄的中华儿女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驻守在桓仁的东北军第一团团长唐聚五，在桓仁县师范学校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成立了民众自卫军，写出了“杀敌讨逆，救国爱民”的口号，举起了民族抗日的大旗；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在老秃顶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武装；铧尖子学校校长李向山投笔从戎，奋战疆场，组织“大刀会”与日本侵略者英勇博斗。一九三五年，在桓兴县委的直接领导下，桓仁的各族人民，各界爱国人士，勇跃参军参战，积狠为抗联送情报，抓汉奸，做军衣，筹粮款，支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在全国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桓仁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又开始了争取解放的斗争。首先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反奸除霸，歼灭反动土匪武装，粉碎反革命叛乱，肃清敌伪残余，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对敌作战，阻止了敌人北上，

支援了北方战场，一九四七年，桓仁县人民得解放。以后又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继而又进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文史资料将通过各方面人士以亲历、亲见、亲闻的独特形式，生动具体地反映我县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这一个时期的面貌，真实地记录我县人民反侵略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历程，为研究编写我县我省和我国近、现代史提供必要的史料，以弥补文书档案之不足。文史资料还将对我县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丰富、生动的乡土教材。

文史资料工作，一定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持爱国主义的方向。这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是推动祖国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它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可以促进各种不同出身，不同社会经历，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团结起来，是我们实现祖国大统一，大团结的最广泛的思想基础。文史资料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征集和出版文史资料，可以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及海外爱国人士，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这对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全民族的大团结，必然

起到特殊的作用。

当前，爱国统一战线空前广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已经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正在全国展开。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坚持爱国主义方向，显得更加重要，意义更加深刻。我们一定要紧紧把住这个方向，把它贯彻到文史资料征集、研究、整理、出版工作的全过程中去。

《桓仁县文史资料》辑以爱国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再现了我县一定历史时期的各方面的史实。它不仅为我们了解桓仁，热爱桓仁，建设桓仁提供生动的教材，也一定会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的统一战线，为我县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运筹帷幄　八天五捷

——杨靖宇将军西巡战事记实

单明生　搜集整理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在缴获敌人战马，将军部直属部队改为骑兵后，由柳河地区，开始西巡，到桓仁县老秃顶子周围，转了一圈，视察军情，听取部队和地方工作汇报，宣传鼓励抗战，部署下步任务。在这期间，与敌人发生五次战斗。在敌强我弱形势下，杨靖宇将军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术，加上政治工作的配合，不但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而且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首战"品字军"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杨靖宇军长，率三百骑兵，由桓仁县的海青火洛出发，经新宾县的哈塘沟、碗铺，到于家大院住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军长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动员民众参军参战。这天晚

上，住在罗圈沟，与一师会合。五月十四日上午，杨军长正在给部队开会时，从平顶山方向来了一连伪军（该部原系土匪，名“品字”，后投降日寇），被红军（群众称杨靖宇部队为“红军”）打得丢盔卸甲，向榆树底方向逃跑了。红军当晚转移到登厂。

增援大刀会

五月十五日早晨，由登厂出发，经不奇眼挺进到桓仁境内的庙岭时（川里村黑石头沟至高俭地村头道沟的岭岗），看到十八个日本兵正在山坡吃饭。这时，路遇的一帮大刀会首领，为了在红军面前显示威力立一功，再三向杨军长请战，军长只好允许他们进攻。为了防止大刀会失利，军长随即派少年营暗中掩护。大刀会老师给会员“上法”后，头扎红布，手持红缨长枪，从山上直奔守备队冲去。日本兵发现来了大刀会，便架起机枪，猛烈射击。一刹那间，把大刀会打到沟底下，并死伤数人。正在攻不成，退不了的时候，少年营在对面山上打响了，立即将守备队火力压下去，并打死一名日本兵，其余的逃之夭夭。从而，大刀会得救，退出战场。

冲击高丽城

少年营与守备队激战刚结束，从罗圈沟和平顶山分别来了两股敌人，一股从红军的西北方向，即不奇

跟，另一股从红军南面，即头道沟围攻上来。顿时，步枪、机枪还有小炮声，连成一片。杨军长命令部队，边还击，边沿着大岗向东撤退，尖兵很快就占领了海拔近千米的三棱顶子，掩护部队撤到高丽城。敌人认为高丽城南面是开阔的大沟，白天红军不敢下山，生怕红军从高丽城东或西突围。所以，敌人紧紧地控制了高丽城以西的二道沟和东面的各个山头。杨军长考虑高丽城山大坡陡，不适骑兵活动，故不能在此地久战。此时，接到地方工作人员报告说城南没有敌人。于是，派一连兵力，向南坡山下突围，然后抢占孔家岭南侧的制高点(现在丫头岭以北的山峰)，正好，把从平顶山来增援的敌人封锁在岭西。红军大部队，顺利地从高丽城下山，通过高俭地大沟，奔仙人洞去了。

这天，红军打算住仙人洞。但是，过了哑巴岭，听说仙人洞有敌人，便向西转，经冰沟子，到新宾县的陆家堡子住下。五月十六日，经东瓜岭，部队到桓仁县的老岭沟和于家堡子住的。十七日，计划经门转岭、石灰窑岭去洼子沟，再经岗山回山里（红军在蒙江一带根据地）。但到丝房子知道暖河子有敌人，便向东转移，当晚住在果松川。

激战歪脖望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日，红军从果松川出发，经

大小石棚沟，连翻两个岭，到油瓶沟南岗时，杨靖宇将军用望远镜一看，蔡我堡村上下全是敌人。军长问一师副官李向山：“蔡我堡有敌人，石灰窑岭无法通过，怎么走好？”副官答：“我们可从这儿下山，出油瓶沟，进大砬子沟，翻过歪脖望，经红塘石大皮匠沟，再奔洼子沟。”军长同意，派李副官带尖兵先行。

这时，军部直属部队加一师二百多步兵，共五百多兵马，正向歪脖望挺进时，被敌人发觉。敌人派一部分兵力回头北上，占领石灰窑子岭，包围了歪脖望以西和以北；用大部分部队，向砬子沟追击；二户来方向从冯家堡子来的敌人，占领了歪脖望以东的鹿圈子沟。

歪脖望山高坡陡（海拔八百多公尺），上下山都不能骑马，只好一个战士牵两匹马先上山。大部队边阻击，边向山上撤。李副官率尖兵，马匹紧相随，上了大岗，从大丫口向北顺排坡道下山，刚到冯家沟人家，后面的战马下到歪脖望沟底停车场时，通化伪军廖旅的一个连，从石灰窑子，横跨趟子沟、羊咩子沟，走到南台南面的车家坟，看见红军战马一字型下山，便是一阵机枪，迫使大部分牵战马的红军战士，调头跑回南大山。廖旅的这个连，随即抢占了歪脖望沟的东西两条岗。李副官带尖兵和四五十匹战马，越过大沟，占领红塘石北山头，准备接应主力部队的到

达。

杨靖宇军长看到南有追兵，东、西、北全被敌人包围，便命令主力部队，占领了歪脖望大岗的各个主峰，居高临下，南北还击。军指挥所，在大岗上构筑了临时工事，传令兵从这里跑来跑去。战斗上午十点多钟在砬子沟打响，下午一时左右在歪脖望北坡接火。尔后，华尖子保甲、自卫团从蹚子沟攻上来，被红军一阵机枪，打退到沟底，不敢再上。敌人主力在砬子沟和鹿圈子沟方向，但是，这两面地势对红军有利，敌人只能远距离射击，不敢靠近。对红军威胁最大的是廖旅的这个连，他们占领的这两条小岗，离红军的战马最近，全在步枪射程之内，封锁了红军下山的两道沟。这时，军长命令："停止对这股伪军的射击，开展政治攻势"。于是，红军对这个连高唱爱国歌，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喊着喊着，敌人的枪声停了。他们回话说："我们派一名连长，你们派一名连长，到咱们中间地段讲和"杨军长随即派教导团三连刘连长，带近十两大烟，到达指定地点。经谈判，知道他们是通化驻军廖旅所属，来者是栗连长。正谈着，从二户来载来两汽车日本兵，到红塘石下车，向南山冲来。栗连长说："我是不是中国人，你们看着，我马上把这些小鬼子打回去。"果真，红军一枪没放，日本兵被伪军打退在山下。

谈判继续进行，栗连长说："你们现在四面被包

围，只有从我连枪口下撤走。但是不能白天走，如果你们白天从我连面前通过，我不打你们，对日本人没法交待。你们可以在天黑之后，就从这道沟下山北去。我保证不打你们。”并商定了撤退的暗号。最后，栗连长还送给刘连长几袋子弹。

谈判之后，军长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做了夜间撤退的部署。当晚九点钟左右，红军从各制高点撤下来，并在原来居守的阵地上点燃了火堆。为了防止有诈，派一个排为尖兵，按协定的路线下山。廖连不但一枪没打，还高喊："别着急，慢慢走。”就这样，红军全队兵马，从歪脖望大山撤出，经羊咩子沟到老学堂集合后，进洼子沟，当晚住在海青火洛。

红军撤走的山头，廖连占领了一部分，接着这个连和守备队、其他伪军断断续续地互相打了一夜。第二天，谁也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时候走的。

这次战斗，打了将近一天半宿。伪军死一人；红军牺牲二人，死战马五匹。红军的一名战士叫任长山，是桓仁县大恩堡人，死在歪脖望南坡大砬子沟沟里，他的头被敌人挂在东堡村内的大柳树上。红军牺牲的另一名是张班长。他一个人上了鹰咀砬子，监视南面的敌人。因为当时已是青纱帐起，草木葱绿，视线受阻。不知从哪面，爬上来一名伪军。这伪军也不知道砬尖上有红军。当他爬上去，两人对光时，谁也来不及开枪，便搂在一起搏斗。结果他俩同时从南坡

滚砬子摔死了。后来，蔡我堡的群众给二名红军战士的尸体就地埋葬了。

迂 迴 大 青 沟

五月十九日，红军在海青火洛休息半天，又出发了。当红军走出不到二十里时，种地的群众告知："大青沟门柳毛甸里有敌人。"红军尖兵调头回师。敌人看红军发现他们了，便开了机关枪。有一部分敌人，在抢占山头时，身影暴露在红军机枪连的眼前，一阵机枪，敌人死伤六人。杨军长率队折回海青火洛。这时，军长认为，骑兵不适合山区作战，便决定改编骑兵，把全部战马转交给一师和地方党组织处理。然后，一师留在桓仁新宾一带，杨靖宇将军率军部直属部队，轻装步行，当天午夜，再经大青沟，顺利地回山里去了。

牵着鼻子走　歼灭邵本良

单明生　搜集整理

一九三六年三月末，杨靖宇军长率抗联部队活动在集安县三道崴子一带时，在打垮奉天骑兵团以后，汉奸邵本良部队（这个部队的官兵屁股后带一块獾子皮坐垫，所以群众称之为“大尾巴队”），以前多次中计，均遭惨败后，重整旗鼓，由通化追来了。自此时起，邵本良在地面追击抗联，日寇派三架飞机在天上侦察轰炸，并用电台与基地联系，直至第三十三天，邵本良进了杨靖宇的口袋阵，全军覆灭。

牵　着　鼻　子　走

杨靖宇多谋善战，认为邵本良来的好，他要不跟我们走，我们就没有“运输大队长”了。于是，杨军长决定采取走和拖的战术。但是，敌人住了三天，不跟了。军长为了引诱敌人上钩，指示抗联白天攻打沙包甸子警察署。这下子，把邵本良牵出来了。抗联由集安经摇钱树，进入桓仁境内，再经横道川、马圈子（今向阳）、宽甸的滴水砬子、小雅河、桓仁的老漫

子、果松川一线西行。因为这一带尽是山沟，邵本良已多次吃亏，不敢追近了，生怕再进口袋阵。抗联走，邵本良也跟着向前走；抗联住，邵本良也住，两军总是保持二三十里的距离。

敌 机 炸 百 姓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抗联早饭后，由冯家堡子出发，经蔡我堡，上午八点钟左右，进驻木盂子。部队住好后，军长传令召开群众大会。全村集合近百人，来到军长住处张国邦家门前的大街上，军长走出房门，对大家说："乡亲们，我们是抗日联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的任务，就是抗日救国。希望老乡们，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要和抗联一条心，联合起来，打败敌人……"杨军长讲话不到半小时，即上午十点多钟，突然从桓仁飞来三架飞机，群众会散了，人们都往自家跑。敌机在人群大乱之时，狂轰乱炸，仅十几分钟，扔了三十多枚炸弹。

原来，邵本良追至果松川时，断定抗联必到木盂子站脚。邵认为，木盂子街地处深山峡谷，是陆空夹击消灭抗联的理想地势。于是，他做好了战斗准备。以前，他都与抗联保持半天行程的距离。唯有今天，他起早，从果松川出发，上午十时以前，占领了木盂子前山大岗（现在二院后山），等待已用电报调追飞机的到来。飞机一到，"大尾巴队"的步枪、轻重机枪

一齐开火。此时此刻，抗联头上有敌机扔炸弹，对面山上有敌人机枪猛烈射击，全军处在危急关头。久经锻炼的抗日联军，在杨靖宇将军指挥下，毫无损伤。其实，杨军长早有指示："每逢进村，只准住小房小院"。军长本人也住进一个两间草房。在敌机投弹和敌步兵射击时，军长首先命令部队隐蔽，然后，派一连兵力，占领狐狸洞南岗（现在粮库西山），对东山敌人还击，掩护部队撤退。全军不慌不忙，很有秩序地从木盂子西河套向高俭地方向，安全撤走了。

日本鬼子的飞机和邵本良的机枪，对付抗联，毫无作用。但是，它们屠杀黎民百姓，还是很有能耐的。在飞机刚来时，人都从外面往家跑。当炸弹一响，各家各户的人，都往外逃。这时，王金亮领着全家老少，跑到后河套，飞机从马圈沟门折回二次投弹，正巧一枚炸弹，落在他们全家附近爆炸了。王金亮太阳穴中一弹皮，当即死亡；他怀里紧抱着一个三岁的孙子，这孩子虽未中弹，但因他爷爷已死，双臂紧紧搂住他，把他活活地箍死了；王全亮的儿媳梁福珍，眼巴巴地看着二孩子被箍的尿水直驰，但因为自己身受重伤，动弹不得，救不了自己的孩子；梁福珍怀里抱着一岁的女儿，头被炸伤，半月后死去；梁福珍的男人王玉山，左腿肚子肉被炸掉了，仰卧在地。全家六口，死三口，伤两口，只剩一个五岁的孩子，在他爸爸的背上，免遭遇难。

有一流丑高老四的小伙子，看飞机扔炸弹，背起他父亲往外跑（老头有病，不能走），刚出房门，在院内响了一个炸弹，高老四一急之下，把他父亲放进房檐下的一口大瓷缸里，他自己跑了。当他回来的时候，房子被炸着火，他父亲在缸里活活烧死了。

被炸死的还有唐玉田的母亲、中药铺邓先生的老伴。林茂成是蔡我堡人，来木盂子办事，被炸成重伤，回家后死去。当家的死了，年青的寡妇领着两个儿子改了嫁。被炸伤的还有王福山等人。

当时，木盂子的大财主苗玉株，家开买卖，三合大院，院内拴着四五匹大马。敌机以为杨靖宇定住此院，便轮番向这座大院投弹，院内落三枚炸弹，房子被炸起火，烧毁八间房屋，使七家佃户寸草不留，所有家产全被烧光。在这正要春耕的时候，迫使这些农户，只好背景离乡，四处乞讨。

孙吉仁家住木盂子下山头(现在二院下边山根)，这天早饭后，抗联自己带的苞米面，在他们家做的干粮。做好后，送给他家一个大饼子。这时，他母亲领他去马圈沟，正走半路，飞机来了。他们娘俩回头从北山根往家跑。在过河时，被西山上的邵本良兵打了一阵枪，他母亲身中两弹，绕道跑回家。这位孙吴氏，年仅三十岁，因为受伤不得治疗，不到一个月就死了。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杨军长率抗联部队，正在老秃顶子以西向南行军。日本的三架飞机，

向西飞到高俭地村的修家大院时，盘旋两周，开始投弹。共扔三十多个炸弹，没炸着人，也没炸中房屋，在院外炸死修家的马驴各一匹，修家老少，在惊吓之后，抱头痛哭，心想："日本人太坏，我们老百姓，没遭没惹，平白无故，为什么炸我们家！？眼下就要春耕了，炸死牲口，怎么种地？"内心的怨恨，不敢流露，只好含着泪，在大门外扒马皮。上下的邻居，都到修家探望，帮助剔马肉。下午一点多钟，刚把马肉处理完，正在往外躲借驴肉时，那三架飞机又来了。有上午的教训，人们明知不妙，便撒腿就跑。敌机看到一群人，东奔西跑，立刻投弹。有一个炸弹落在院中，吓得藏在屋里的妇女和小孩，都往外跑。十岁的修德，跟在母亲的身后，他母亲背着他五岁的弟弟，左右还有他哥哥、哥哥的童养媳及哥哥的小舅子。他老奶奶在他们前边，正跑着，身边落一炸弹，眼看着把老奶奶炸倒了。他母亲领着一帮孩子，绕过炸弹坑，冲出大门洞以外不远，只听轰的一声，什么也不知道了。飞机走后，他老爷爷和他父亲回来一看，他妈、哥哥、嫂子、弟弟、老奶奶和哥哥的内弟全被炸死；他被埋在土里，奄奄一息；正房中间被炸塌了。全家十三口，片刻之间，死了五口。家破人亡的灾难，使活下来的人，只好提起讨饭筐，分两邦去北省逃难。

全歼邵本良

抗联经大小铜邦，四月二十六日来到马鹿泡的龙爪沟，三架敌机又来投弹，把宫事务长炸死。这时，战士看着敌机天天在头上飞，不是炸死老百姓，就是战友受害；后边还有一个大尾巴，天天紧跟．国恨家仇，都要求早报。军长的警卫员王传圣说："军长，快点下决心，早点把这个尾巴打掉算了"。军长拖着长音说："别着急，不到时候。"

抗联当天过高丽道岭，到宽甸县四平街，与一师会合。原来，一师驻在韭菜园子，几天前接到军长调兵命令，按时来到此地。这时，军部直属部队加一师部队，一千余人。军长决定就地休整。军党委连续开会，杨靖宇军长兼政委分析：第一，现在官兵再三求战，士气高昂；第二，与一师会合，我军兵力优势；第三，敌报纸说我溃不成军，他们真的以为我不敢决战。邵本良被我军牵走已一个月，他求功心切，容易上钩；第四，再向西行，居民少，山势对我有利。消灭邵本良的时机已经成熟。军党委一致通过消灭邵本良的决定以后，向部队进行了充分地战前动员。四月二十九日，抗联向西转移到施家。

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抗联天亮前吃完早饭，翻过西山，出摺帽沟，向北转，进了凤城县梨树店大东沟沟里的石门以后，布好了口袋阵，准备全歼邵本良。

大东沟长二十多华里，进沟后，比较开阔。到沟半腰的曲家街，沟向正北。在曲家街上边不到一华里处，由东大山向西延伸一条岗，岗头高一百多米，将大沟拦窄，沟宽只有百米左右，此处叫石门。进石门，沟放宽到二三百米，东西山高坡陡。由石门往沟里，到"纪家大茔"（纪家坟），有一千五百米左右。从纪家大茔分岔，去东北方向一条沟，沟里是五里长坡；往西北一条沟，是正沟，过北大岗，是本溪县的兰河峪境内。由纪家大茔向西北不到一千米处，是滴水砬子。这个地方沟宽不到一百米，地势险恶。杨军长派少年营另配两挺轻机，守住石门沟口；东山一挺"三八"机枪；纪家大茔后山，是这段深沟的中心拐角处，南对石门，全在机枪射程之内，还可顾及滴水砬子。所以，把几挺重机枪全放在这里；滴水砬子安排一挺轻机和一部分步兵，准备截住敌人尖兵；进石门不远的西北山头，派少年营的一个排把守，军长特地嘱咐，一定守住这个口子，防止敌人向西山小沟突围；主力部队埋伏在路东河套的树林中；部队的后勤和群众向导，能隐蔽在山上的柞蚕场里。上午八点钟左右，一切摆布妥当，军长和其他首长，从石门到滴水砬子，再走一遍，看看有没有破绽。

全军将士，盼望邵本良早点来。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也过去了。"该来了，是不是邵本良害怕，不敢来了"？战士们有点着急了。但

军长心有数："邵本良今天迟早要来，不在此地消灭邵本良，绝不收兵。"在埋伏三个多小时的时候，敌人的三架飞机来了，在这条沟上下，飞了一个来回，没发现任何情况，向东飞去了。飞机的盘旋，战士们打心眼高兴："敌人就要来了。"

原来，邵本良这天早饭后，经施家，过西岭，出摺帽沟，上午十点来到曲家街，支锅做饭。不到十二点，由曲家出发，很快全军进入石门。邵本良勒马停步，沟里沟外，东山西山，端详仔细，自言自语道："杨靖宇啊，杨靖宇，你不是军事家。你若是在这个窄沟堵上，我可就完了。"邵本良正在沾沾自喜之际，石门山头上的命令枪连响三声。顿时，重机、轻机、步枪从四面八方射向大道上的敌人。大尾巴队个个心慌意乱，明知中计，沟里的敌人回头拚命往沟外跑；沟门的敌人，被机枪截断回路，急忙往河套跑，钻进路东的柳树毛里。他们那知道这里已等半天的抗联战士，迎头痛击。敌人毫无准备，只有乱撞乱躲，无法还击。在敌人死伤惨重，乱作一团时，抗联战士，手端刺刀，一齐冲了出来，喊杀声大震，有些敌人举手投降。顽固的敌人，插到一块草甸子里的水泡子周围，被抗联战士撵得跑来跑去，这里的小柳树和杂草全被踩倒了，敌人死尸成堆，河水变红了。这时，守在西山头上的少年营排长，看沟底冲杀不停，自己在山上得不到杀敌机会，不如下山帮助战友去缴

械。于是，他留下一个班守阵地，自己带两个班下山与敌人拼搏去了。经过多个回合，邵本良判明，唯有西山火力弱，便带一部分残兵败将，向西山一个小沟冲去。封锁这道沟的排长已经下山，寡不敌众，到底让邵本良领二十多人冲出去了。

邵本良在突围时，身受重伤，回沈阳后死去；随邵本良部队的日本人炮兵中队长菊井少佐，当场毙命；日本指挥官英俊志雄，判准逃跑不能，便倒在死尸堆里，把别人的血，抹到自己头上，装死。战斗过后，他逃命了。

这次战斗，打死敌人一百多名，死尸装了满满三马车；伤近二百人，伤兵抬到第二天早晨；邵本良部队（包括一个炮兵中队）八百多人，除跟邵本良逃出的和死伤的，全部被俘。抗联将俘虏的军服留下后，每人发五元钱路费，当场释放。下午三、四点钟，他们穿着白色衬衣，三五个一伙，一二十个一邦，垂头丧气地顺道往沟外走去，稀稀拉拉的过了半下午。打死敌战马（包括邵本良的黑色骑马在内）二三十匹。缴获电台一部，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步枪四百多支，迫击炮和小炮七门。至此，赫赫有名的东边道“讨伐少将司令官”、铁杆汗奸邵本良主力团全军彻底崩溃。

抗联死十七人，在收拾战场后，将牺牲的战士当场火化（在滴水砬子下边的一个旧房框里烧二具尸体；在纪家大茔旧房框里火炼三具尸体；在敌人死伤

最多的一带死十二人，将他们放在头一年涨水冲积的浪柴堆上火化的）。抗联在处理完牺牲的战友之后，带着大批战利品，到五里长坡集合，点兵后，翻过大山，将电台连夜秘密送到老秃顶子根据地藏起来，部队向桓仁的外三保一带去了。

访抗联军部遗址

白　冰

寻迹攀上二层顶，
密林深处访兵营。
石板当记鏖战事，
蒿草正是焚后青。
松挺云头将军志，
水流山巅鬼神惊。
杜鹃簇簇烽火起，
耳畔犹闻征马鸣。

注：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经仙人洞冰沟，扪萝攀藤，登上老秃顶之二层顶。这里有人民英雄杨靖宇将军的足迹，燃烧过抗日的烽火，闪烁着抗联的军威，抗联一军一九三六年军部遗址尚存。

杀敌讨逆　抗日救国

——记抗日民族英雄唐聚五在桓仁的抗日活动

许清　白冰　搜集整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广大民众对日寇的凌虐齿裂发指，当时黑龙江的马占山，吉林的丁超、李杜、冯占海、王德林，辽西的黄显声、郑桂林、耿继周、张海天等先后奋起抗日。一九三二年春，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高潮中，辽宁东部旧称东边道的地方，崛起了一支抗日劲旅——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数月之内，这支队伍发展到三十余路军，二十余万人。北至长白、安图，南至桓仁、宽甸，方园数百里的广大农村和部分县镇皆在统辖之下，形成了一个与日伪政权相对立的民众抗日根据地。这支抗日队伍的主要领导者就是当时年仅三十四岁的民族英雄唐聚五将军。

唐聚五，原名唐福隆，字甲洲，满族正黄旗，祖居辽宁金洲，一八九九年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兰棱乡。是讲武堂六期毕业生。一九二九年，唐聚五晋升为辽宁陆军步兵于芷山的第一団中校団副，驻防凤凰

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日军在沈阳发动事变的第二天凌晨，驻安奉路的日军铁道独立守备第四大队，突然包围了东北军驻凤凰城的第一团团部及驻守部队，团长姜全我被俘，后投降了日军，近一营的官兵被缴械。当时正在乡间的唐聚五，惊闻事变，星夜奔往山城镇，向辽宁东边镇守使于芷山请示。此时于芷山已为日方所拉拢，态度暧昧。在这种情况下，唐聚五不顾风险，乘车潜赴北平。于九月三十日秘密会见张学良副总司令，报告了姜全我投敌之事。张学良很气愤，立即委任唐为一团团长，并指出政府不让抗日，可以组织民众，“召集自卫军，抗日救国”。唐聚五很受感动，衔命回到山城镇。那时山城镇镇守使于芷山还没有投敌，见唐是张学良亲自委任他为属下的一团团长，只好让他接任，派到桓仁县驻防。唐聚五对张学良的指示铭记在心，返到桓仁后，就秘密进行组建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

当时，唐聚五能够直接调动的只有身边的一个营，另有第三营驻扎新宾态度不明。第二营已被日军缴械，后虽重新组建，但指挥权已被于芷山所控制，唐聚五深知在这个时候组织抗日武装，必须要搞清带兵人的政治态度。为此，他首先找了桓仁县的公安大队长、早年结拜的盟兄弟郭景珊。郭原来也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在部队缩编时转入张学良在沈阳的新民through泽储才馆警察班学习，后分配到桓仁县任职，他控制

的公安大队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唐找到郭后，两人一拍即合，郭当即表示：决心毁家纾难，同唐一起抗日到底。并提出，辽东五十八县公安局长、大队长全是他在新民同泽储才馆警察班的同学。可以和他们联系，谨慎争取，共同抗日。于是，他俩派人秘密联络了宽甸、辑安等县公安大队长，均得到支持。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唐聚五得知原东边镇守使署中校参谋处长李春润到新宾接任第三营营长。然后，用电话把李叫来（他们是讲武堂的同学），唐聚五见面就说："老同学啊，我同郭景珊大队长准备抗日，他已经联系了几个县的老同学、老同仁，对这事你也说说，有什么想法？"李春润当即说："团长和郭大队长既已同意，我也不甘落后，愿听指挥"。唐聚五抚掌大笑，连连说："好、好、好啊！那你就赶紧回去准备吧。"李春润连夜赶回了新宾。接着唐聚五又争取了桓仁县长刘铮达，公安局长张宗周等实权人物。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秘书黄宇宙到桓仁县找唐聚五，带来了救国会和张学良的密信，要求东边道地区军民组织起来抗日，并向唐聚五介绍了沿途各县爱国志士的情况。所以唐聚五进一步扩大了与通化、临江、柳河等县的抗日力量的联系。

一九三二年初，于芷山任伪奉天警备司令，并于一月底，纠集两个团人马，赴辽西镇压义勇军。至

此，于芷山的汉奸面目已经暴露。三月一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根据当时的形势，唐聚五认为举旗抗日的时机已经成熟，于三月二十一日，召集了各抗日首领到桓仁秘密集会。在会上，一致决定成立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公推唐聚五等五人为救国会常委，唐聚五任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并根据所联络的抗日首领，任命了十八路司令(以后发展到三十余路)，五个大队司令，基本队伍五万余人。会后，令各路抗日队伍领导人加紧准备，接到总部命令后立即起义。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唐聚五、郭景珊等人，将家属秘密送往北平。

唐聚五举旗抗日的消息，被汉奸于芷山察觉。他怕兵变，利用各种手段，妄图阻止唐聚五。三月下旬，于芷山派驻通化的第二团团长廖弼震到桓仁见唐，以探听虚实相机拉拢降日。唐聚五知风声已露，请来了县里的农、商会长等士绅陪同廖弼震打牌饮酒，虚以应付，闭口不谈抗日之事，使廖不得要领而去。于芷山见此计未成，又电令唐到省开会，唐不予理采，回电拖病相辞。这时于芷山正要按规定向各团发放一批军饷弹药，唐聚五派人前往山城镇领取，使于芷山大伤脑筋。如若给唐部发放，唯恐该团一旦举旗抗日，便会如虎添翼。但若扣下不发又怕因此引起该部不满而激起兵变。拖了十几天后，于芷山见唐仍无举动，为进一步拉拢起见，最后下令发放部分军饷弹药。其

实唐聚五按兵不动，正是等待这批弹药。他见弹药已经领出，立即命令各部马上举旗抗日。

四月二十一日，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誓师大会在桓仁县师范学校操场隆重举行。大会主席台上方悬一白布，上书“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誓师大会”。在桓仁的自卫军第一、五、七路和群众万余人参加了大会。操场上人山人海，凡参加大会的都拿一面小标语旗，气氛极为热烈。当唐聚五、张宗周、郭景珊、王育文、唐玉振、李各润、孙秀岩、刘铮达等和各县代表莅临会场时，会场上掌声雷动，欢呼抗日救国的声浪此起彼伏。

会上，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宣誓就职，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天下事最痛心者莫过于亡国。日本强占我东三省，生灵倍遭涂炭。凡有民族气节者，怎能容敌猖獗！今天，我们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军，就是肩负光复山河的重任，毁家纾难，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说到激动时，取出马刀，割破右手中指，用鲜血写下：“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个大字。使全场出席人员，无不深受感动，群情激昂，“打倒伪国，还我山河”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向全国发出了抗日通电，内称：“……昊天不吊，倭贼内犯，焚杀淫掠，横肆蹂躏，数月之间，几无宁日，且复威胁。溥仪建造伪国，强迫民意，勒令服从，以灭朝鲜故使，重施于

我。凡有人心者，谁不共愤！聚五等分属国民，已立守土，职为军人，尤须杀敌，今而不起，更待何时？况荷国家之重任，受民众委托，大义所在，刀难袖手。今择于四月二十一日，爰整所部，与民众联合，共同一致，起而讨逆。困难当前，人必奋勇，仇不戴天，势必歼尽。临敌之际，弹尽则短接，刃折则肉搏。渴饮敌血，饥餐虏肉，前者仆后者继，不灭倭贼，誓不生还！……”大会结束后，进行了示威游行。唐聚五骑着一匹黄膘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头，率众绕城一周。这次大会后群情激奋，有数千人参加了抗日自卫军。自此，在唐聚五等人的领导下，东边道地区人民群众反日斗争的烈火燃烧起来了。

为使这支队伍能够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他们从上到下进行了严密地组织工作，对各路首领都加以委任。当时民众抗日自卫军军政组织系统情况是：

辽宁省救国委员会常委有：唐聚五、张宗周、黄宇宙、刘铮达、郭景珊。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唐聚五，委员张宗周、黄宇宙、唐玉振、李春润、孙秀岩、郭景珊。

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王育文，委员刘铮达、裴焕星、苏显杨、姜中天，富先杰，韦仲达。

各路军辖三个团，各支队和旅长，所辖两个团，团长军衔为上校。每团辖三个营，营长衔为少校。每营辖三个连，连长衔为上尉。

各路和支队、旅，设迫击炮一个连，轻机关枪一个连。总司令部设卫队营，营长中校。总司令部设参谋长一人，军衔为少将。设八大处，即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军需处、军医处、粮食处、秘书处、军法处，处长衔为上校。各路和支队、旅设参谋长，军衔上校。各处长军衔为中校。

总司令及各路司令名单：

总 司 令：唐聚五

副总司令：张宗周　黄宇宙

总参谋长：张　毅

总 参 议：李世勋

警备司令：文　录

宪兵司令：郭景珊

骑兵司令：魏荫楼

卫队旅长：惠玺光

一路军司令：唐玉振

二路军司令：常永林

三路军司令：康乐三

四路军司令：先李振山　后为李子荣(李春光)

五路军司令：张宗周

六路军司令：李春润

七路军司令：郭景珊

八路军司令：徐达三

九路军司令：包景华

十路军司令：王桐轩
十一路军司令：梁锡福
十二路军司令：文殿甲
十三路军司令：王乐山
十四路军司令：时远岫
十五路军司令：先是文录　后英若愚
十六路军司令：孙秀岩
十七路军司令：孙公雨
十八路军司令：先高德隆　后为林振清
十九路军司令：王凤阁
二十路军司令：邓铁梅
二十一路军司令：刘景文
二十二路军司令：关向阳
二十三路军司令：夏兴福
二十四路军司令：李桐周
二十五路军司令：赵新民
二十六路军司令：姜中天
二十七路军司令：李先翘
二十八路军司令：张连波
二十九路军司令：盛御枫
三十路军司令：卢崇田
三十一路军司令：高丽祥
三十二路军司令：丁育昌
三十三路军司令：苗可秀

总司令部根据各路兵力和武器配备情况，分派到各地驻防。

第一路军唐玉振部，驻防在桓仁的二户来；第二路常永林部，驻防桓仁的沙尖子；第三路康乐三部，驻防本溪和新宾的交界处；第四路李振山部，驻防本溪县；第五路张宗周部驻防桓仁县城；第六路李春润部驻防新宾县；第七路郭景珊部驻防通化；第八路徐达三部驻防临江；第九路包景华部，驻防清源南山城一带；第十路王桐轩部，驻防新宾旺清门；第十一路梁锡福部，驻防新宾苇子峪；第十二路文殿甲部，驻防清源；第十三路王东山部，驻防宽甸牛毛坞；第十四路时远岫部，驻防宽甸；第十五路文禄部，驻防长白；第十六路孙秀岩部，驻防柳河；第十七路孙公雨部，驻防通化英额布；第十八路高德隆部，驻防辑安；第十九路王凤阁部，驻防柳河孤山子；第二十路邓铁梅部，驻防凤城；第二十一路刘景文部，驻防岫岩；其它各路也都占据有利地势，驻兵把守，对日伪军的进攻形成了一整套的防线。

唐聚五于桓仁誓师后，领导各路人马投入到紧张的杀敌讨逆的斗争之中。首先，于四月二十四日给通化县公署发了一封电报，指出："本各意在救国，暂不承认伪国国旗存在，贵县各机关如再迟疑观望，即不啻为虎作伥，与敌为友。义师待发，有逆必讨；军行在即，可西可东，顺逆之从请即电复。"在电文催促

和十六路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通化县当局不得不召集地方维持会会议，决定即刻改悬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当时廖弼震部在通化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在此情况下，只好假作支持抗日。四月二十八日，孙秀岩部在通化各界民众的欢迎下进入了通化县城．不久，唐聚五将总司令部迁到通化。

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成立后，和敌人打了许多胜仗，大小战役不下百余次。各路军是以各县为中心，各据一方，各自为战。

一九三二年五月，孙秀岩、李春润两部，于新宾打败了汉奸于芷山的讨伐后，于芷山从新宾逃回山城镇，继续与自卫军为敌。五月下旬，于芷山命第三团团长姜全我为司令，徐文海为副司令，带领两个营的兵力和一部分地方武装，侵犯宽甸县城。当时驻防在宽甸的十四路军司令时远舳，率部奋力抵抗，终因敌我实力太悬殊，队伍众部被缴械，宽甸失守。时远舳电告通化总司令部，唐聚五令驻桓仁二户来的一路军唐玉振部驰援。唐玉振部力战两昼夜，也因敌我实力悬殊未克宽甸城。唐聚五又派驻桓仁的五路军张宗周部和七路军郭景珊 部增援，并令驻牛 毛坞的十三路军的王乐山部接应。各路军星夜赶到，张宗周任前线总指挥。自卫军把宽甸城围得水泄不通，经过四个小时的鏖战，姜全我、徐文海已力不能支。不料王乐山的十三路军，因武器不佳败退下来．一路、五路、七路

也被迫退了下来。直到两天后，各路才又重新配合好，经过半天多的激战，才把宽甸城重新攻下来。姜全我、徐文海乱中逃命。敌人被歼一个营。

敌人不甘心于失败。六月六日夜，鸭绿江彼岸的日军，组成步炮兵联队，约有千人，从蒲石河上岸，攻占了宽甸县南部重镇永甸、长甸河口，并向宽甸城逼近。张宗周、唐玉振、时远岫三路，奋勇迎敌。经过剧烈的激战，双方伤亡惨重。自卫军七路二十团团长孟吉胜（华尖子人），在这次阻击战中阵亡。经狗鱼汀，磨岭两次战斗，我毙敌四十余人，后由于弹药不能接济，退守宽甸县城。日军遭到自卫军阻击，不敢冒然北犯，便用飞机撒下传单，声称：如自卫军不撤走，就用飞机炸毁县城。在此情况下，唐聚五令该部撤到桓仁与宽甸的交界——坎川岭布防。

七月初，唐聚五亲自到坎川岭前线慰问战士，视察边界设防情况。坎川岭是宽甸、桓仁边界的交通要道，距桓仁城百里，这里山高岭大，森林茂密，地势十分险要。唐聚五看到岭上的战壕和沿壕搭成的简易窝棚，驻守的官兵情绪饱满，十分高兴。在军人大会上，他对官兵们鼓励了一番。然后坚定地说："以前我们节节撤退，是为消耗敌人，把敌人引进深山，最后把他消灭。别看小鬼子武器好，进了这深山老林，它的飞机、大炮就不灵了。他们再来进攻，我们就用土枪土炮和鬼头刀消灭他们！"七月十六日，伪鸭绿

江地区剿匪司令姜全我，副司令徐文海率八百余人向坎川岭发起进攻，他们依仗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一度接近岭上自卫军阵地。在这紧急关头，几百名大刀会战士突然冲出阵地，挥舞长矛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杀伤伪军近百人，敌人遭到突然袭击，纷纷败退。这次战斗，大刀会战士有十八人壮烈牺牲。以后，姜全我、徐文海部龟缩老巢，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在唐聚五和其它将领的领导下，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在其它各县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到处打击日伪军，使敌人闻风丧胆，大大地鼓舞了抗日民心，振奋了抗日军威。

一九三二年八月，经在北平的张学良同意，辽宁民众救国会和自卫军各路首领在通化集合，决定以辽宁民众救国会为基础，暂设辽宁省政府，公推唐聚五为代理省政府主席。八月十日，唐聚五宣誓就职。鉴于自卫军的发展壮大，为了便于统筹指挥，将各部统一编成五个（后扩展为七个）方面军。先后委任了李春润、孙秀岩、王凤阁、邓铁梅、张宗周、郭景珊、孙景文为各方面军的总指挥。为了夺取反日斗争的更大胜利，进一步明确了各方面军进攻的方向、目标和相互协同问题，并有计划向敌人展开攻势。

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的反日斗争，被日伪视为心腹之患，敌人从一九三二年九月即开始秘密集结兵力，先后调集了日军高波所部骑兵第一旅

团，附加所部骑兵第四旅团，茂木所部混成第十四旅团，并从第二、第八、第十师团中抽调部分兵力，充实上述部队。与伪军廖弼震、姜全我、曹国华及伪靖安游击队各部相配合，部署于沈海、安奉铁路沿线。又令第二师团从朝鲜一侧越江西进，与铁道独立守备队和空中飞行大队相配合。总计日伪军三万余人。从十月十一日起对东边道地区发起全面攻势。

敌人攻势开始后，唐聚五立即布置各方面军加强防御，令各部坚决阻击敌人。但日军上有飞机侦察轰炸，下有坦克大炮开路，骑兵步兵随后攻击。王凤阁、孙秀岩、李春润等各部自卫军虽在险要关隘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战，都因抵挡不住敌人的重武器攻击而先后溃败。日军首先占领了新宾尔后直逼通化。在这种情况下，唐聚五只好下令各部队向抚松退却。通化、桓仁等县亦先后放弃。

十月十四日晚，唐聚五率总部人员一起由通化撤往抚松。到了抚松后，因形势危急，唐只好带了几个随从潜赴北平。其它各路人马全部分散，以待东山再起。

唐聚五虽然离开了东北，但他在东边道地区点燃的抗日烈火并没有熄灭。第十九路王凤阁部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七年。李春润、梁锡福等也于一九三三年重返东北抗日。这些将领牺牲后，自卫军的许多零散部队又加入了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军继续抗战。唐聚

五在关内时刻仍关注东边道人民的抗日斗争，念念不忘重返东北。他对身边的官兵说："青山常在，绿水常流，我唐聚五还是要回东北抗日的。"

最终，唐聚五将军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

首战日寇告捷

邵文津　搜集整理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农历三月十六日），唐聚五在桓仁师范学校（现在第二中学校址）召开了万人参加的抗日誓师大会。人们为不遭日寇的蹂躏与掠夺，于自卫军队伍组成的不长时间里，桓仁县东路的二道岭子、横道川、巨户沟、四平街、摇钱树、干沟子、二道阳岔；西路的铧尖子、木盂子等地先后从吉林省的红土崖请来了武功老师，又组织起“大刀会”，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英勇搏斗。

在自卫军、大刀会刚刚组建近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一九三二年的五月中旬，日本关东军的一百余人（其中有被抓的朝鲜民夫二十多人）在一名少佐的带领下，从朝鲜楚山过江，试探性地向桓仁县境内偷袭而来。消息迅速传开，人们奔走向告，听说日寇一路上奸淫烧杀，抢掠拉夫，无恶不做。再者日本鬼子是啥“鬼”模样，谁也没见过，所以百姓惶惶不安，扶老携幼，背包担担，带着吃的，离开家园上山避难。

自卫军、大刀会探实了日寇进军路线、日期、人

数及武器装备后，自卫军、大刀会各派出五十多人，事先来到现今的沙尖子乡下甸子村焉家堡子后面“王八脖子”的山岗上。自卫军埋伏在山岗梁上，大刀会员埋伏在山岗下的树林中和河边的柳树毛子里。

那天头晌一切布置停当后，一直等到日头偏西，只见葡萄架岭顶上，日本的膏药旗，在明晃晃的刺刀上愰荡着，前面有四个尖兵，接着是穿着白衣服的朝鲜百姓，赶着二十多匹驮子，尾随的便是日本兵。他们一下岭，见到房子就放火，见到鸡鸭就抓，见人就杀。在葡萄架岭根底下的道边井湾旁用枪打死了农民刘德生后，就直奔侯家堡子而来，一时间，葡萄架岭下的沟筒子里，黑烟滚滚，火光冲天，鸡叫狗咬，一片惨景。

日本鬼子都到侯家堡子，日头西沉快要卡山儿了，他们准备在这里埋锅造饭住下。堡子里老邸家爷俩，一时没来得及躲避，让日本兵发现了，当场被枪杀身死。就在这时，请假探家从五里甸子新开岭归队的大刀会会员方秀华（后在辽宁民众自卫军队伍里当了营长），身背套筒子枪正奔跑在侯家堡子对面的漏河边上，他猛听堡子内枪响，误以为是日本鬼子向他射击，于是便迅速躲在河沿边一棵两搂多粗的大榆树后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日本官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着十来个日本兵，直奔河边而来。这时，方秀华急忙推弹上膛，刚要举枪瞄准，这个戴着少佐军衔

的日本官，却在离方秀华十来米远的道边上勒马站住了，举起望远镜便向“王八脖子”山岗上望去，那些日本兵也跟着往那边看，还叽哩哇啦说些什么。这时，方秀华便端起枪瞄准那个日本官就是一枪，只见他应声栽到马下，一命呜呼。跟随的日本兵没辨明是怎么回事，也没发现方秀华，吓的乱打转转，有的去搀扶日本官，有的糊乱地往天上打枪，慌了手脚，多数日本兵只顾护理那个日本官去了，方秀华便趁机顺着河套的树趟子里向王家堡子方向跑去。如此同时，来到侯家堡子的日本兵落脚未稳，听到河边枪响，一时不知所措。此时，“王八脖子”山岗上的枪声如同炒豆一般，突突地向鬼子射来，特别是大刀会的会员们（日本人称之为铁人），他们黄布包头，有的手持红缨枪，有的挥舞把缠红绿布的大刀，如同猛虎下山般地向鬼子冲来。日本兵失去了指挥官，天又放了黑，山岗上的枪又直门的响，大刀会员冲到他们面前，对准日本兵又捅又砍，吓的他们哆哆嗦嗦，手忙脚乱地架起小炮和机关枪，向前河沿和北面山岗上发射。河边上那十来个日本兵懵头转向，反向侯家堡子的日本兵开了火，敌军一时乱了营，战斗足足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已是天黑下罩，自卫军、大刀会认为再战不利，便主动停止射击，向干沟子撤离，日本鬼子才惊魂少定，龟缩到侯家堡子，不敢离去而住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日本鬼子便急三火四的用马驮子驼着尸首向

东逃跑，滚出了桓仁县境。

这次战斗，日本鬼子死亡约四十多个，我方只有大刀会会员牺牲三人。这是我们桓仁县人第一次打日本侵略者，也是用土枪、猎枪、大刀长矛奇迹般地打败了洋枪洋炮的关东军，而且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为全县人民抗日斗争坚定了信心，树立了榜样。

投笔从戎　为国捐躯

——记李向山在桓仁的抗日活动

许清　白冰　搜集整理

李向山原名李瑞林。一八八四年生于辽宁省桓仁县bù尖子乡东堡村一个大户人家，家有土地六十余天（一天合九市亩）。童年时，过继其三叔抚养，年幼读私塾，学业结束后，从事教育工作，是桓仁县教育界非常有名望的爱国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大刀会进行抗日。抗联到桓仁后，带领抗日武装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为一师副官，一九三七年被日寇逮捕后遭杀害。

李向山青年时期，由于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思想进步。他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曾说：“孙中山是爱国忠良，治国有方，实可敬也。”所以他在二十九岁时就把名字改为李向山，以表示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

中华民国时期，李向山先后担任桓仁县民立学校校长，桓仁地区教育界稽查员、劝学员兼桓仁县土地委员、建道委员。鉴于当时读书的人很少，尤其在农

村，因生活困难认农不认学，很多青少年不能念书。所以他在任劝学员时，到处规劝人民子弟上学读书。后来，为了使人民增长知识，唤起民众觉醒，他在铧尖子乡创办了一所学校，取名“三乐”，担任该校校长。他对人们讲，能在家乡举办这样一所学校，不仅国家乐意，乡亲们乐意，黎民百姓都能乐意，并亲笔书写三乐学校校匾。当时这所学校影响很大，凡是桓仁西路，北到新宾的学生，都在这个学校读书。以后这些学生对李向山举旗抗日，参加民众自卫军和抗日联军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向山得知沈阳已被日寇侵占，他对祖国的危难感到忧虑，对日寇的侵略行径怒火满腔。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天坐立不安。妻子看他变成这样，便劝他要保护好身体。李向山对妻子说：“奉天被日寇侵占了，等于整个东北失陷，中国人民的生存有很大的危险，老百姓必然会遭大难的。”并说：“这么大个中国，叫一个小国欺负到了家，真耻辱！耻辱！”

一九三二年春，驻守在桓仁县的东北军辽宁陆军步兵第一团团长，民族英雄唐聚五，鉴于困难当头，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抗日。李向山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日夜奔走四处联络。妻子问他：“你常在外面干些什么？”李向山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呀！你不要多问。”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在桓仁师范学校操场召开誓师大会时，李向山带队参加，被委任为自卫军的团长，驻防铧尖子乡的捞道沟岭。此时，驻在八区（铧尖子）的警察分局杜局长见势不好不辞而别。李向山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毅然当了八区的分局长兼管当地的事务。自卫军由于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使用的武器又多是长矛大刀，所以半年后，在日寇的强大攻势下失败了。日寇占领桓仁后，李向山在铧尖子村开大车店，与于盛武等人经常联系伺机进行斗争。

一九三三年二月，李向山和于盛武见时机已经成熟，在日寇的强大压力下，他们把部队拉到普乐堡与徐文海反正部队会合，与日寇进行斗争。于盛武拉出去后，在桓仁宽甸等地活动。李向山的队伍，群众称"老家亲"（民间流传小鬼怕老家亲），在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在桓仁、新宾等地，与日本鬼子进行游击斗争。此时，他闻听盘石、海龙等地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领导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斗争。所以，他委派长子李在野多次去联系，却没有联系上。

一九三四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根据党的指示，开辟新的游击区，以韩浩团长为首的先遣部队，到桓仁地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们首先打听到，李向山拉队伍在桓仁一带抗日救国。二月二十一日下午，韩浩在海青火洛大沟里，见到李向山后，假

装要参加队伍打日本，李当即表示欢迎。后来，李看韩不象普通农民，心中产生怀疑，唯恐是敌人的密探，便说："我们都是良民百姓，和日本友好共荣，怎么能打日本呢？"韩浩听了"哈哈"笑了起来。这一笑也引起了李向山妻子的疑虑，真以为是便衣密探来了。她抱起不满三岁的儿子，对李向山说："咱们快去给孩子看病吧。"此刻，韩浩已看出他们的疑虑，便亲切地说："李校长，听说你举旗抗日，率众杀敌，我们是专程来拜访你的，如果孩子真有病就去看看吧。"李向山一听韩这么说，便问："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韩浩微笑着说："我们是东北人民革命独立师，从根据地来的。"说着掏出了证件，自我介绍说："我姓韩名浩。"李向山看过证件，紧握韩浩的手，激动地说："以前几次派人前去找你们都没找到，没想到你们光临到此，真是有失远迎。"然后叫妻子准备饭。饭后，李向山把谢教头找来，安排了一些事情，跟韩浩走了。半月后，李向山回来，对妻子说："这次我可见到红军的杨司令了，大高个子，关里人，岁数不大，有能耐。中国有这样的英雄好汉是不会亡国的。等着吧，红军不久就会把队伍开来的。"

一九三四年秋，李向山率队在洼子沟正式参加了红军。当时有五十六人，四十八支步枪。杨靖宇很器重李向山，说他有文化，能写能讲，安排他在军部作

秘书工作。不久杨司令便任命他为一军一师副官，协助师长工作。一师经常活动在宽甸、桓仁、本溪、通化、辑安等地，由于李向山地形熟，人也熟，对于在这些地区打击日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自从一军一师到达桓仁后，在老秃顶子、八里甸子、仙人洞、高俭地、川里、海青火洛、洼子沟等地陆续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特别是李向山率队参加抗联的消息传出后，群众纷纷报名参军打日本，其大多数是李向山的学生。

李向山任一师副官后，积极协助师长研究作战方案，提供各地区的详细情况，使一师在桓仁地区的活动比较活跃。同时，李向山还担任了宣教工作。一师每到一个地方都召集群众开会，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到处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军民团结起来的作用。一次，李向山在群众大会上说："亡国就是亡命，要想不亡命就得保住国家不灭亡。日寇的侵略就是要屠杀中国人民，妄图强占我们的大好河山和毁灭中华民族。凡是有志气的中华儿女，都应该起来与敌人进行战斗，要保护家乡，保住国土，保住我们的同胞。愿意抗日救国的青年们，勇士们，赶快起来参军参战，我们拍手欢迎啊！"他的讲话鼓舞人心，很受群众拥护。

在李向山的宣传鼓舞下，有很多青年人受到了启发，纷纷起来参加抗日队伍。与此同时，李向山还亲

手写出歌词，谱上曲，教唱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振奋革命精神。他教唱的《雪花飘飘》、《四季歌》等十余首革命歌曲，不仅每一个革命战士会唱，而且游击区的老百姓也都会唱。战士们休整时间唱，在战场上对伪军也齐声歌唱。这歌声，对瓦解敌军，打击日寇，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很多次战斗中，伪军士兵听到歌声，便抬高枪口，停止进攻，甚至转过枪口，朝日本鬼子打去。

李向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革命意志非常坚定。他在革命歌曲六条中写道："我们不怕飞机大炮新式武装，死不投降，绝不卖国，坚决把日抗"。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李向山在铧尖子一带威信更高，他经常让铧尖子财主出钱出粮支援红军抗战。一九三六年铧尖子东西堡八大富户劝他说："李校长，我们每户出一锭银子（一锭白银合八十元小洋钱），你拿到奉天或天津，开个买卖或隐居都行。这样，你可逃出日本虎口，我们也不会跟你受牵连"。李向山说："我不能看着家乡人民当亡国奴，宁死要革命到底，决不流落他乡。"

当时在桓仁地区，拉伙上山为"匪"的有几十个帮头。在这几十帮"土匪"中，绝大多数都进行过抗日活动，很多是民众自卫军的残部。如何对待这些人？一师派李向山为首的政工队去进行宣传、开导，教育他们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要抗日救国，一致

对外，不干危害老百姓的事。从而使大多数“土匪”投靠了红军。一师对这些人实行了教育、联合、改造、收编的政策。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能够听从一师指挥的“土匪”大小帮头三十余股，他们是：“老北风”、“胜利”、“北海龙”、“小中央”、“红山”、“九江好”、“朱海乐”、“宗盛”、“于乐好”、“西海山”、“全省”、“大南洋”、“占山红”、“四季好”、“占东洋”、“天良”、“大喜字”、“中央好”、“金山好”、“东北海山”、“三省”等，总人数达千余人。这些“土匪”中，除一部分人正式被红军收编以外，其它“土匪”不准在抗联根据地内绑票、抢劫，只准到敌占区绑大户、打警察和日本鬼子。在军事上，和这些“土匪”联合，订立同盟，互相配合。一九三五年“老北风”被红军收编以后，当时他有一百多人，一师任命他为大队长，指挥五个分队。在本（溪）桓（仁）等地，和日伪军进行过多次战斗。“东北海山”陈广太，于一九三六年在高丽墓子接受改编。一师根据他的人员多，武器装备较好，编为十二团。在对日作战中这些战士都表现得很勇敢。在攻打铧尖子和二户来警察署的战斗中，这些抗日军都有根地配合了抗联部队的进攻，进而取得了胜利。

李向山随一师南征北战，参加过大小数十次战斗。通过联合、改造、改编“土匪”之后，一军一师

在桓仁的威信大增。为了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充分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使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真正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桓仁县广大群众在韩震部长和县委书记李明山的领导下，在李向山的影响下，纷纷起来抗日，建立了地方的抗日组织反日会和抗日武装。反日会不分阶层，只要群众愿意抗日均可参加。任务是：宣传反满抗日，为抗联筹集给养，传递情报。这期间，李向山安排自己的大儿子李在野担任采购、运输兼联络工作。以车老板为公开身份，身上暗藏红军护照，多次从沈阳等地，给红军购买枪支弹药、油印机、缝纫机、布匹、药品等军需物资，使一师在桓仁建立兵工厂、被服厂、医院，有了充足的原料和器皿。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韩震、李向山在高俭地决定设立反日地方委员会，任命阎桂铭（后被捕叛变）为地方委员。这一组织为抗联筹款四次，共一百二十七元伪币，军粮九十五石，制做便衣十五件，鞋十五双。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师宣传干事小马在仙人洞一带建立一支青年义勇军，又名“小孩队”，队长姓王，指导员白云起，共三十余人，除有六、七支六枪外，其余都是土枪。这支队伍曾在韩震和李向山的指挥下，于仙人洞、钓鱼台截了两次大商人的货车，在仙人洞头道沟截过大商人的马驮子。

一九三五年秋，韩震、李向山、李明山、张永奎

等，在海青火洛、横道河子、洼子沟、川里、文治沟、曲麻菜沟等地，建立了两支农民自卫队。第一大队长张永清，指导员孟广尧，队员三十余人。这支队伍在韩震和李向山的指挥下，在高台子曾截下大商人十一辆马车的货物，货物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群众，一部分交给了抗联部队。又为海青火洛的抗联医院筹粮三石多。第二大队长宫殿阁，队员三十余人，于一九三六年改编为抗联的特务队。他们为一师侦察敌情，直接受一师全指导员领导。相继韩震和李向山又在川里建立了一支农民自卫队，队长张丙录，队员三十余人，这支队伍主要活动在桓（仁）新（宾）交界处。

反日会组织和地方自卫队建立起来后，有力地配合了一师在桓仁的抗日斗争。特别是一师在桓仁实行“二．五”减租减息政策以后，限制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废除了高利贷，保障了农民耕种土地的权力。在仙人洞对地主李明玉、王珠等人采取了减租减息措施；在高俭地没收大地主林茂官五石多租粮；在铧尖子乡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姜六是大地主，凡是其地户除交给抗联一半租粮外，另一半留给自己，不准交给姜六，如其不干，就报告抗联，一次没收姜六一百八十多石粮食。“二·五”减租减息政策的施行，使根据地的群众更加拥护和支持抗联部队。

一九三六年秋，日寇一面实行归屯政策，一面利用汉奸、特务、土豪劣绅，对被抗联收编与抗联结成

联盟的义勇军，采取了威逼利诱等手段，诱使其投降。大部分山林队，经受不住特务的威胁，先后一批批下山投降，至一九三六年冬，几乎就没有抗日军和抗联部队合作。使抗日联军在战术配合和群众的支持方面受到了很大影响。因此，抗联部队在日寇的围剿下，不得不退出抗日根据地，只留少部分部队在桓仁各地进行周旋。当时李向山由于身体有病，师部留他带一部分人在原地坚持斗争。

一九三六年三月，日寇为了追捕李向山，通过密探逮捕了李向山的堂弟李森林、儿子李在田、妻子陈发荣和不满五岁的儿子李在友。把他们抓到二户来警察署关押了二十八天之后，又带到桓仁县城警察署关押了十五天。日寇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问李向山哪去了。他们回答"不知道"。敌人最后无奈释放了他们。

尔后，日伪特务又捕抓了李向山的大儿子李在野（东北大学生，九·一八后，弃学从事革命活动），问李向山在哪？李在野说："三百里地以内没有，哪去了我不知道。"日伪特务不相信李向山能离开桓仁。又问李在野，如果在桓仁境内找到怎么办？李在野坚定的回答："如果能找到李向山，就砍掉我的脑袋！"敌人为了放长线抓李向山，把李在野释放了。从此，李在野的大车队不能行动了。有人劝李在野逃走，李在野说："我父亲的身体不好，不能离他太

远，如有什么情况，也好有个照应。”在以后李向山被捕的头两天，李在野被捕了，抓到县城后，被日寇点了“天灯”，最后填入浑江壮烈牺牲。

一九三六年春，敌人为了捕捉李向山，由二户来警察署特务股康太贤（朝鲜族人），指定田宝昌、唐金两个特务，在铧尖子一带收降“土匪”和李向山的部队。主要任务是收李向山。田、唐领命后，回到铧尖子不在警察署住，而住在王家床子，以掩人耳目。田、唐又具体的分工，分别进行出探。这两个特务在其主子的指使下，到处打探李向山的行踪。

一九三七年一月，李向山带着传令兵由海青火洛转移到新宾县大青沟的黑瞎望，住在地窨子里。当时由于敌人实行了集家并屯政策，李向山带领部队在山上接触不到群众，时常没有饭吃，有时只得煮高粱，煮苞米吃，使部队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时，李向山正患病在身，不能行走。传令兵看情况危急，便翻过岭到了洼子沟，伺机弄点粮食和衣服。在路上，他遇到了东堡村的王则香用牛车拉柴禾，便上前给截住了，把人和牛带回黑瞎望。李向山对王则香说：“由于抗日联军的活动有困难，现在缺粮少米，你让家里给送点粮食来，我们就放你回去。”王则香见此情景，便设法和家里人联系。此时，王则香的父亲和弟弟见人和牛没回来，知道出事了，便找金风山、于增尧二人给联系（这二人与李向山有联系）。这

件事很快被特务田宝昌知道了，田把情况向康太贤进行了汇报。康、田密谋后，他们找老王家问了事情的经过，便和老王家设下圈套，让老王家出头找金、于二人，假称东西买妥了，让金给送去。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金风山被老王家请去吃早饭。康、田、唐等特务伪装红军，到了老王家。唐说："老王家，东西还没准备好吗？"说着进了里屋，田趁机上炕打了金风山一拳，立即把金风山绑了起来。然后连推带打到了于增尧家，把于增尧也绑起来，一同带到铧尖子警察署。康对金、于二人进行了严刑审问，金、于供出了李向山的详细地址，并应承带路抓李向山。

当天下午，康太贤打电话给桓仁警务科，报告了李向山的详细情况。同时，警察署长蓝仁居，命令警察到海青火洛和洼子沟的沟门站岗戒严。每个沟门去了五、六名警察，只准沟里往外出人，不准沟外往里进人。傍晚，桓仁县警务科金主任坐汽车到了铧尖子，和蓝仁居密谋了一阵后，带领一百五十名警察和保甲兵，抓了一百多名老百姓，共二百多人，由金、于领路，连夜摸到黑瞎望。由于敌人白天封锁了消息，李向山和传令兵在地窨子里没有防备。敌人冲进了地窨子，李向山被捕了。当夜，李向山被敌人带回了铧尖子警察署。特务们高兴了，想诱骗李向山，再抓杨靖宇，现从饭馆要来一套好饭好菜，送给李向山吃。

李向山说："我不当亡国奴，不吃满洲饭。"第二天早晨，县里来了三卡车宪兵，把李向山绑在汽车中间。敌人怕抗日联军堵截，不敢走大路直接回县，而绕道经八里甸子、普乐堡回到桓仁县城。当路经八里甸子时，汽车被修道的工地堵住了，李向山趁此机会向修道的民工们讲了话："乡亲们，同胞们！我李向山从来没当过一天亡国奴！我死了不要紧，东北有三千万同胞，中国有四万万人民，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能亡，日寇必须滚出去，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李向山被押到县城后，敌人又用飞机把他送到沈阳。在沈阳，敌人对李向山进行了严刑拷打，李向山始终不低头，最后被杀害了。

李向山牺牲后，桓仁县的乡亲父老无不悲痛。他那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坚决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他那战斗的一生，那投笔从戎、为国捐躯的英雄形象，激励着人们永远前进。

李向山除奸记

单明生　搜集整理

李向山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与李甫臣（高俭地人）等人一起，组建一支大刀会，在桓仁新宾一带进行抗日活动。一九三四年一月，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李向山率领大刀会六十多人，住在洼子沟大杨木林子娄家街。铧尖子自卫团团长于海涛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天下午，率警察和自卫团五、六十人，向大杨木林子扑来。

大刀会看沟外来了伪军，便向沟里撤走。伪军全用“快枪”，老远就放枪，边打边追。大刀会跑到沟里，都上山了。伪军紧追不放。两军相距不远的时候，大刀会在山岗上向伪军喊话：“于海涛！我们已经跑了，你可以回去向日本人报功啦”。于海涛不听大刀会的劝告，指挥伪军“往前追”。大刀会向山上又跑了一气以后，李向山喊：“于海涛，我看在咱俩是拜把兄弟的份上，我败退就行了，你回去吧”。于海涛求功心切，又依仗自己武器好，那肯回去，带领士兵，边打枪，边向山上穷追不放。李向山看出于海

涛忠心效劳日寇，这样的汉奸再不除，更待何时。便下令：“队伍隐蔽，待于海涛靠近时，冲上去，把他除掉”。一心想为日本人立功的于海涛，继续往前追。突然间，由树丛中冲出大刀会，手持大刀和扎枪，直奔山下冲来，“嘿哈嘿哈”声，震天动地。胆大的伪军，对大刀会放了几枪，一个也没打着，眨眼之间，大刀会已近在眼前，吓得伪军调头就跑，各自逃命。身为指挥官的于海涛，当时已四十多岁，个矮体胖，还吸大烟，那能跑快。警卫员宋庆春和伪军曹善清，见团长跑不动，就在左右搀扶他。这时，于海涛已是真魂出窍，两腿发软，一步也不会走了。警卫员回头一看，大刀会已经来到了，便松了手。于海涛仰卧在地，一个大刀会员，上前一枪把他刺死。另外一些会员，端枪向前冲，追赶警卫员和伪军。宋、曹二人拚命往沟外跑，跑着跑着，曹善清在明冰上滑倒了，大刀会上来就是一枪，又刺死一个。宋庆春终于逃出去了。

战斗过后，李向山率大刀会，向新宾县察家--带去了。

西 江 惨 案

王明玉　宋玉峰　搜集整理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西江惨案》就是日本侵略者，于一九三七年农历正月十三，在桓仁杀害我抗日人士、无辜百姓，亲手制造的一起惨绝人寰的填江案件。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沈阳，东北各地的爱国志士，广大民众奋起反抗。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农历三月十六日），辽宁抗日“民众自卫军”在桓仁成立了。共整编了二十二路军，唐聚五任总司令，张宗周任副总司令。民众自卫军成立后，于农历五月一日在永甸和日军交战，使敌方死伤四五十人。五月六日在宽甸南门外，把一小股日本兵打败后，退到桓仁砍川沟岭防守。伪鸭绿江剿匪军马司令，率军对砍川沟岭发起了两次进攻，都被抗日民众自卫军第五路军打退了，打死日伪军约四十多人。到十月中旬，辽宁民众自己军终因素质太差和武器装备不良，被迫由砍川沟岭撤退到蒙江。

抗日民众自卫军主力撤离桓仁后，零散的自卫军，有的在自己的小头目的带领下，组成了小股分散的抗日武装，有的弃甲归田，有的四散上山。如："海山"、"占山红"、"大南洋"等就有几十邦，不断地袭击日本侵略者。

一九三四年二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挺进到桓仁老秃顶子地区，经过一段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在桓仁各地的小股武装，一部分被收编为杨靖宇的部下。战时听从红军调遣，袭击日伪军，平时捕捉汉奸、特务，惩办不法地主，为民除害，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广大群众积极要求参加红军，并组织起来为红军传递情报，筹备军粮，转运军需物质等。抗日联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队伍不断扩大，狠狠打击了日伪军。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扑灭抗日烈火，加强"地方治安"，实行了所谓"治本"工作。组织了大批警察特务，配合日本守备队下乡"剿匪"，搜捕红军地方工作人员和抗日群众。

一九三六年春天，又开始了"集家归屯"，把分散在各山沟里的住户，都强迫归到几个指定的大村子里去。日本守备队到处巡查，把山沟里的房子烧掉，把东西抢走，见人就抓，不是投进监狱就是杀头。各大園子里设置了警备所，有十多名武装警备人员，日夜站岗放哨，限制群众出入，割断红军、抗日武装与

群众的联系，实行经济封锁，使抗日联军在吃、住等方面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困难。又加上红军密营经常遭到破坏，红军主力只好向北转移。剩下少数的抗日武装，有的继续坚持抗日活动，有的因为环境艰苦，当了"土匪"，也有的变节投降当了汉奸。

一九三六年六月，日伪在桓仁的宪兵队、警察特务机关、东边道特别工作部等一起出动，到桓仁各地对抗日军和"土匪"做所谓"收降"工作。并威胁城镇绅士下乡作保，配合特别工作部和警察特务做诱降欺骗工作。还利用亲属和私人的密切关系，对抗日军进行封官许愿，采取金钱收买等手段，使少数人动摇变节，其中个别人投降后，又充当日伪特务。就这样，到一九三六年年底，把一些零散的小股抗日部队和"土匪"陆续骗下山来。并让这些被"收降"的人都要到县警务科司法股去，由司法股长张寿彭负责按手印，采指纹，还用缠在一起的三根针，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在被"收降"人的左手虎口上或左胳膊腕子扎出血，揉进墨，做为记号，然后再放回家去。

一九三七年农历正月十一日，特务股和司法股下令，让全县各警察署，在正月十二这天，把被"收降"人员全部送到县警务科司法股领"证明书"。各警察署接到命令后，陆续把人送到县城，由司法股长范斌和警尉初景山负责点收。当天晚上，把这些人都送到东关警察训练所和几家客店里去住。

一九三七年农历正月十三日，这是人们难忘的一天。这天早晨七点钟左右，日本守备队在西江岸约二华里以内，实行了戒严，断绝行人与车辆通行。并强迫车夫、行人和被甲长传来的人一起，在西江沿水深处（现在的西江桥以下五十米处）顺江砍成一个三间房子大小的冰窟窿。与此同时，所有来领"证明书"的人都到县公署西院集中。八点多钟，由县城警察署长徐万程带队，警务科特务股股长金永奎，司法股股长范斌，警尉初景山等人和警察、便衣特务，负责押送。他们让来领"证明书"的人排成四路纵队，顺东关大街步行到西关守备队大院。

到守备队大院后，先让这四排人都两排两排对面站着，听日本军官训话，然后分别被关进几个大屋子里去。在一间小屋子里，由日本人设堂审问。这些来领"证明书"的人分批受审。被审查的人，除了七个小孩和一个叛徒外，把嘴都给堵上，用商会早就准备好了的绳子全都捆了起来。

负责装车的是特务股长金永奎和一名姓韩的特务，另外还有警察署的人以及县城各分所里的人。他们把这些被捆上的人往车上扔，横七竖八的落在一起。由纪纯义和警尉张洁臣负责，带领收查班和第二期训练班的人，往西江沿押运。一共用四辆汽车（警务科两辆，守备队两辆）每辆车派四名警察，每辆车装三十人左右，装满一辆，运走一辆，从守备队后院

一直拉到西江沿。拉到了地方，全都推下车，并强迫这些领“证明书”的人都跪在已经砍好了的冰窟窿边上。

十点多钟的时候，守备队长野田和宪兵队长（名不详）指挥守备队、宪兵队往江里填人。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先是用洋刀砍，刺刀挑，把人杀死后再填到冰窟窿里去。有的受难者不忍心身首被砍杀，就自己跳到江水中去。后来，这些刽子手们砍杀的累了，就把人活活地推到冰窟窿里去。冰窟窿里的人填的多了，有的就漂浮上来，守备队、宪兵队就用木杆往里捅。这三百多名来领“证明书”的人，就这样全部被杀害了。尸体填进了冰窟，鲜血染红了江面，其惨状，真是目不忍睹。直到晚上，还能听到从西江沿传来的马达声，日本兵的嚎叫声和伪警察的吵闹声。

在这些死难者中，大多数是坚持过抗日的“民众自卫军”，被俘的红军战士，地方工作人员，还有被认为是“土匪”和“通匪”的群众。

西江惨案之后，日本守备队又命令各警察署，收捕没到县城领“证明书”的被“收降”的人，就地处决。拐磨子警察署长朱文元，亲自带领保甲兵，一夜抓了十二人，于农历正月十五日，在老黑漫子枪杀之后，填入富尔江。二户来警察署长黄金兰，于农历正月十四，在二户来南门外处决十一人。沙尖子警察署

在马圈子枪杀了十九人。其他警察署也都在到处抓人杀人，全县被杀害的人很多，无计其数。

到了春暖开江的时候，被填进冰窟窿的尸体，逐渐都漂浮上来，顺着浑浊的江水向下漂流……。

《西江惨案》虽然已距今近五十年了，但这家仇国恨，民族的灾难，就象当年那带血的浑江流水一样，深深地流进了人们的心中，永远也不会忘掉。





西江惨案幸存者——孙忠臣

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的片断

刘在东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沈阳事变。当时，我正在奉天萃升书院读书，夜晚，炮声隆隆，人心惶惶，夜不能寐，翌日，百业萧条，全城寂寂，处处呈现一片凄凉景象。从此，东北三千万同胞，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下，过着背井离乡、妻离子散、饥寒交迫的生活。目睹穷凶极恶的敌人，践踏屠戮无辜的同胞，从而激起我的爱国心，民族恨。为了保卫祖国，毅然奋起，支身入关，参加请愿队伍，投身抗战洪流。

赴京请愿

“九.一八”事变后第七天，我下定决心：“宁作丧家犬，不作亡国奴。”束装入关，直奔北平。途经辽西高山子车站时，恰逢众匪袭击火车，险些丧命。翌日凌晨，列车飞奔天津，八时许到达北宁车站。此刻，我的心情激荡，久不平静，素所仰望的国都北京，终于呈现在眼前，几乎热泪盈眶，同时也庆幸自己是虎口余生。站台上高悬着“救济东北难胞”的白

布横额。即日正值中秋佳节，内心喜悦，透露快感。

当国破家亡，孤身无依的时候，满目苍凉，心情凄切，吟诗一首：一把酸心泪，忍看山河碎，奋挥祖逖鞭，拯溺心不愧。

乘车直奔西城中国大学，通过几位老同学的帮助，改居宣武门外江西会馆（第四救济所）。经交涉后，承蒙书院负责人的支持，张学良将军答复每月发给二十元生活费用，又迁到东城汪家胡同东鸣公寓。此居安适，可以温习旧课，可以寻友聊天，有时还可以到奉天馆走走，与东北老乡叙旧。当时在京的各省都有会馆。奉天会馆位于西城旧刑部街迤北，房舍宽敞，正厅为会议室，东北民众请愿团和北平救国会在此办公。

东北民众请愿团，共七百多人，领导成员都是当时的社会贤达：高崇民、卢广绩、阎宝航、王化一、金哲忱、陈先舟、车向忱等。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为团长。

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请愿团由北平出发时，张学良将军派副官处长汤国祯到车站挽留，群众义愤，非去不可，很多学生愤愤卧轨，无已，始允乘车南去。车到天津时，市长张学铭在车站向请愿团进行慰问并讲了话。他说：南方气候和北方不同，要注意健康。

为了解决逃至关内的难胞生活、学生读书及东北被侯等大事，东北民众请愿团赴南京、上海，向南京政府和上海和平会议请愿。当时上海和平会议是为解

决蒋、汪、阎、冯战争，和平处理问题所设的。我们请愿团在上海青年大厅里，会见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没有得到具体回答。胡汉民以对蒋介石不满的情绪对我们说："和平会议不是政府机关，大权不在我们这边，向我们请什么愿呢？！还是问问政府吧！"又说："中国地大物博，丢掉几个省算啥！"当天晚间请愿团住在上海中学，在该校食宿三天后回南京。正值午间，请愿团列队于南京路大街至中央军官学校门前游行。同时与有关方面联系、说明来意之后，允许步入大厅。片刻，蒋介石登台说："你们大家是东北人，现在无家可归，不远千里而来，我是知道的。但是，军事和外交是秘密的，不能公开。政府是个空洞之物，它没有什么力量。主要是在于大家对它信仰和拥护。大家永远信仰它，永远拥护它，它就永远代表你们。今后，做工的做工，务农的务农，念书的念书。你们回去之后，要守本分……"话未讲完，有人报告：天津请愿团到来了。因大厅内拥挤，蒋介石让安排到楼上走廊两侧听候讲话。蒋介石说：你们天津地处关内，没有什么变化，前来请愿这是无理取闹。正说到这，天津请愿团里，南开大学的一位代表，振臂高呼：报告主席！天津事变已经四天了！我们请愿团赶到南京，要与你这个赫赫有名的国家主席谈谈。可是天津事变这是个大事而你还不知道，实在可笑，你不称国家主席资格。代表要求继续说下去，这时，蒋介石

放开嗓子大喝一声“好”！就转身退回。然后有人传达说，让东北和天津请愿团的代表到后厅去听主席讲话。当时众人感到愕然，认为这个天津代表有点莽撞，要惹乱子。结果蒋对天津代表，却给予赞扬并加安慰。

我们请愿团，由中央军校出来后，又到中央党部，在大厅里见到了中央委员张继和吴铁城，他们讲了话。张继在讲话时痛哭流涕说：“我是河北省人，与东北仅一关之隔，唇亡齿寒，我与你们同样感慨。”

我们一路冒着小雨，傍晚到达金陵大学风雨操场上，就住在这里。九点多钟，警宪人员来了，要检查检查。这是因白天在中央党部请愿后，在大厅里凳子底下，发现了共产党的宣传单。检查一番，毫无所得，他们不声不响地走了。翌晨，我们出入就不那么自由了。九点多钟，传来消息：叫大家到金大礼堂集合，听候讲话。刹时间，由执委卢广绩同志引一军官并介绍说：这位是中央军事研究院副院长高维岳，要与大家见见面并讲话。他说：“诸君是从我们东北家乡而来，由北方到南方，路程数千里，要注意健康安全；在南方各地游览之后，还要回到家乡；你们都是青年时代，前途远大，要信仰政府，给我们解决重大问题。以后诸君要为国家贡献力量。”

就在这天，我们全团人员乘车到了中山陵进行参拜。傍晚冒着小雨由南京乘车至下关渡江。又由浦口搭车经漫漫的长途而回到北平。我们奔走南北各地，

呼吁救亡图存，最后还是无结果而散。

我们回到北平之后，依靠自己力量，组织救国会，发动关外义勇军，戮力同心，抗日救国。

投身抗战

一九三二年五月上旬，我的老同学李季代表辽宁民众自卫军总部唐聚五总司令的旨意，突破艰险，潜入北平，于我住所，阐明了旨意。翌日上午，引李季到北平救国会接触关系。从此，李季就长驻北平。当时，我为抗战形势的发展和爱国心情的触动，奋然而起。通过救国会执委卢广绩老先生的关系，由救国会介绍，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中旬，我带着白绢印信回到东北。

北平救国会的白绢印信是这样写的："甲、育同志：今有刘大航去你处工作，希器使之。"（甲是唐的字甲三，育是王育文）

一九三二年五月下旬，在通化会晤了唐聚五将军及其参谋长英若愚以及东北救国会委员长王育文等。从此开始了抗战活动。

我在总部时，唐聚五任命我为中校机要秘书，帮助建立军队。当时，将柳河县向阳镇关向阳的武装编为辽宁省民众自卫军第二十二路军。任命关向阳为司令。我亲自给他送去司令旗和委任状。此后，又与参谋长英若愚建立第十五路军，进驻于抚松、安图两

县。而长驻地点是安图县的第一个大市镇两江口。这时我被任命为第十五路军上校秘书处长。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旬，唐聚五将军败退至抚松县城时，我同抚松县长张元俊、自卫军第七支队司令王永诚协商后将唐装扮一位山货商护送出境，到清源乘车回北平。相继，司令英若愚和几位亲信，也化装回北平。将部队交给地方有力者单大队长。我又到安图帮助穆兴云司令收抚败残各部，共收容一千五百多人。因地方负担过重，不能再收。后来日伪派警特人员到县城，我不能继续停留，遂步行到敦化县乘车，于旧历除夕深夜到达沈阳。仅住四天，我的老师吴廷燮的女公回北平解决孕事问题，我们扮作家族关系，取道大连，乘轮船至唐沽，而转回北平。

在北平期间，会晤了卢广绩、唐聚五、王育文。英若愚司令，不久又回到东北安图县，将原部队经整编后率之入关。

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旬，我第二次出关是在海龙、清源、新宾三县与艾东斋司令活动一个阶段，因敌伪进剿严酷，困难重重，遂脱离部队而潜入沈阳。蒙老师吴向之帮助与金毓绂先生结识，在奉天通志馆任校勘工作。此后，在伪满作中等学校教员整整十年，直至"九三"光复。

（耿喜武　理整）

无辜被抓“思想犯”

系身囹圄近七年

钟如森（字月川）稿　邵文津整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桓仁县人民深恶痛绝，他们为维护其野蛮侵略统治，制造各种罪名，千方百计地进行杀害镇压中国人民，我就是其中受害者之一。

一九三六年，农历八月二十日晚，突然有伪警察和日本宪兵各一人，进入我家，不容分说，将我逮捕到日本宪兵队。当晚桓仁镇内男、女师范学校、职业中学、北关小学等的一部分教员，也都被抓进监牢。第二天，沙尖子、铧尖子、拐磨子等学校的校长，也相继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关押起来。

我被捕的第二天受审，逼我承认参加救国会和缴纳过会费。我矢口否认，凶残的日寇，竟肆毒手，棒打棍抽，悬梁吊、灌凉水，拳打脚踢等酷刑轮番进行。每日每夜，宪兵队院内，身遭毒手的人们，呼天号地，遍体鳞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昼难饮食，

夜难成寐，惨不堪言。

在同年农历八月一日，宪兵队先将地方各界人士，如农会孙余三、吴庆海。商会钟德滋（是我父亲），教养工厂刘怡亭、金聚廷，城关村长盖洪洲，协荣汽车经理刘子藩，县政府内务局长邱春伯，会计股长杨海清，收发股长周发庆，警务股长于济洲，司法股长杨国祯，特务陈云秀、王增智及第一批被捕的男师范校长李景南，女师范校长宋禹言，职业中学校长吕敬五，北关小学校长关麟书等在宪兵队长杉木德五郎命令下，由宪兵和翻译进行审讯，在严刑拷打与逼供下，有各别人挺刑不过，信口胡说，承认入了救国会。还有的承认拿过会费等等供词，遂株连各校教员和地方人士。因此，产生第二批大抓思想犯，日日审讯，邱春伯、孙余三、王在经、金聚廷四人，因刑重死在宪兵队。其余六十几名，在农历十月中旬，由宪兵队协同守备队押送南扎木车站，由沈阳宪兵队接收到沈阳陆军监狱、警察厅、教育厅三处寄押，后由军法处长王冠英和日本杜边两次会审，强制裁判孟继武、李景南、宋禹言、吕敬五、关麟书、王居九、李剑秋、刘子藩、关云綷、王增智十人极刑。判无期徒刑的五人，判十五年徒刑的十二人，十三年四个月徒刑的二十二人，十二年徒刑的四人，十年徒刑的三人，犹予刑五人，宣布释放八人，判后收监管押。当时，我年方三十岁，系身囹圄，铁窗冰室，身遭摧残，每

日两餐，饭稀不见米粒。当时狱内传有“束米煮成两碗粥，鼻风吹的浪悠悠，碗中好似团团镜，苦命之人在里头”反抗的歌谣。

同年农历十一月下旬又转押抚顺监狱。这个监狱是新建的，室内寒气逼人，鬓结冰霜，因服御寒难，堕指裂肤、彻夜难眠，挣扎在死亡线上，苟全生命于倭奴铁蹄下之蹂躏，有的竟死于饥寒和病魔摧残之中。在一九三七年春，我病魔缠身，既无人护理，又不予治疗，奉苍天保佑，得以更生，倭奴之用心，如蛇蝎，如豺狼，毒不可言。倭奴与我不共戴天之仇，子子孙孙，世世相传，不能忘掉。我在监狱关押时，劳动强度过高，生活折磨残忍。例如饮食来讲，“茄子老吃，是不老不吃；黄瓜总吃是不到种不能吃”，形式口头很好，实际还是这种虚情。

我的刑期十三年四个月，后经三次减刑，在康德十年五月十二日期满释放。但是，虽然脱出牢狱，身份上还是被监察管制的要人，外出请假，来客报告，还是动者得咎。我想，若没有共产党领导抗日斗争，无“九三”之胜利，恐亦难活到今，我现年虽近八十，毛血日监衰，志气日益微，但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之心，虽死不能忘。我虽暮年，壮心不已，愿与全国人民一道，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对于四化建设，不遗余力日新月异的迈进，以使祖国的四化建设蒸蒸日上，飞跃发展，人民生活及早实现小康水平。

我全家在伪满抓“思想犯”中的遭遇

王书绅

一九三六年，当时我们全家是十口人，有两位老人，公公和婆婆，兄弟三人，妯娌三人，二位大伯哥他们没有孩子，只我有两个孩子，大伯哥陈鹏飞当年四十岁，是老中华民国公安分局长，日本侵占东北的时候，愤然辞职，在家呆着。二大伯子陈鹏乙是小商人，我男人陈玉峰当年二十七岁，是桓仁县东关学校的外语教员。我那年是二十二岁，是桓仁县立北关小学教员。全家老幼，正在安分守己过日子的时候，不知何故，大祸临头：

一九三六年阴历八月初一晚十一时左右，全家人早都睡着了，忽然大门被撞开，好几个日本兵和伪警察，手持刀枪，一拥而进，闯进屋来，这些人用枪对着我们大喊“不许动”，叫我们全家都坐在一起，将大伯子陈鹏飞捆绑起来，翻箱倒柜，屋子里弄的乱七八糟，孩子被吓的直哆嗦，老人苦苦哀求，也不顶用，最后还是把大伯子带走了。第二天，我到学校听人说，在昨天晚上半夜时，桓仁县的各学校的校长以

及有点名声的人（有抗日思想的人）都被抓到宪兵队去了。家里被抓走了人，也不知是犯了什么法。从这天起，公公婆婆及大伯嫂子一连几天吃不下饭。又过了二十天，也就是阴历八月二十晚半夜时，又来了几个日本鬼子，将我男人陈玉峰也抓走了，哥三个抓去了两个。几天以后，有两个日本宪兵到北关小学去找我，他俩不怀好意，一见到我就动手动脚的，叫我跟他俩到宪兵队去看看那些"罪人"。我说：你们干什么，我要临产了。鬼子大笑起来，改口说：我们是吓唬吓唬你，我们是来拿花盆的，快快全拿来。

我的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二的女孩。从八月初一那天晚上开始，我五岁的大孩被吓得没处躲没处藏的，一听到有动静，起来就跑。听说鬼子要斩草除根，我大孩子晚上不敢在家里住，在我姐姐家磨底下蹲着，盖上破麻袋，等到下半夜才敢上炕睡觉。八月三十日我又生了个男孩，对别人不敢说是男孩，也不敢给孩子起个真名字，家里人就叫他饼子。

哥俩被抓到宪兵队以后，受尽了酷刑，灌凉水，灌辣椒面子，吊起来打，用马拖，叫狗咬。叫你死不了活受罪。大伯哥一看，这个罪实在遭受不起了，就把被抓时手上带的金镏子吞了下去。但被鬼子知道了，又给打下来了，不但没死了，还白白地遭了一回罪。在阴历十月份的一天晚上，日本宪兵将所有被抓去的人，一串一串的绑起来，横七竖八的被装上了卡

车，上边用苫布盖着，很多日本人拿着枪在身上踩着，天亮时被拉到沈阳关东军司令部，等候判刑。被抓去的人当中有的判了死刑，被枪杀了，并让我男人在刑场陪决。我大伯哥判了十一年，我男人判了十五年，都被押在抚顺监狱。

从他哥俩被抓走后，七十多岁的老公公整天忧愁上了火，几个月时间两眼全瞎了，并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死去了。三七年五月大伯嫂子去抚顺监狱看望他们哥俩，见面后，哥俩都不愿意让嫂子马上回来，希望她在那里多住几个月，好月月见一次面。因为长时间住抚顺，花销太大，嫂子只好给人家做饭洗衣服，干些杂活，挣个吃饭钱住宿钱。八月初有一天我嫂子去监狱看望他哥俩，有个姓刘的看守说，你能拿出五百元钱来，我保证让你男人出狱，他还说他和狱长是弟兄。嫂子没文化，也不加分析，就往家里写了航空信，让家里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给寄去五百元。家里只好把三间房卖了一间半，把钱给寄去。八月十三日嫂子收到了钱，就把钱交给姓刘的看守，一心等着男人出狱。等到第二天，嫂子去监狱打听情况，别人却告诉她说，那个姓刘的拿钱跑了，嫂子一股急火串头顶，得了脑溢血，不会说话，不懂人事，于八月十五日晚上死去了，等到天冷地上冻的时候，才把嫂子的灵位拉回来。从这以后，婆母就更加伤心，更加仇恨，常常半夜起来对天叩

头，叫日本鬼子快死光，好让儿子早回来，她饿不知吃，冷不知穿，好像得了精神病似的，过了不久，婆母开始便血，血中带有烂肉，于一九三八年正月十四日也死去了。算起来整整十七个月的时间，抓走两人，死了三口，我家在伪满抓“思想犯”中被害得家破人亡。

（宋玉峰整理）

伪协和会的一些情况

白尔杰

一、建立协和会的背景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侵华野心，猖狂发动所谓满洲事变侵占沈阳。当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拱手将东北大好山河交给了日本侵略者。到一九三二年辽吉黑三省完全被日寇占领。日本强盗为长期霸占东北，成立了"大满洲帝国"。后又继续侵占热河，强迫我国政府承认现实，并向全世界宣布"大满洲帝国"的成立是拯救东北、承天命、顺民意的义举，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当时，我国人民坚决反对，不承认这个伪国家，世界舆论也掀起强大反日浪潮。为此，日寇为掩盖天下人之耳目，强迫东北民众向关东军请愿，要求成立一个所谓适合民意的政府，日寇欲建立一个机构，实质是用来对付世界舆论的谴责，奴化中国人民。就在这种情况下，伪协和会于一九三三年应运而生。

二、协和会的组织概况

伪满协和会在伪首都长春设立伪满洲帝国协和会

中央本部。中央本部长是由当时关东军退役参谋长充任，各省、市设立省本部和市本部，本部长都由省、市长兼任。基层设有协和分会，分会长由各基层行政首脑兼任。各级本部、各基层分会都设有办事机构和专职人员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三、协和会的反动宗旨

日寇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奴化我国人民，达到其侵华的目的，在东北各地都有协和会的组织。它的反动宗旨：

一是建国精神：宣传伪满的成立是日本的义举，当感激日寇的大恩大德，宣传"大日本帝国王道乐土"的所谓前途美景。

二是日满协和：宣传日满要团结、协和，要一德一心，达成日满一家。

三是宣德达情：宣传政府之德政。有关政府的方针政策向人民讲清楚说明白。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困难，通过协和会向政府反映，给予解决。实质是挂羊头卖狗肉刁买人心。

四、伪桓仁县协和会

（一）县协和会组织情况。

桓仁县伪协和会在一九三四年正式成立，名称是"满洲帝国协和会桓仁县本部"，地址在桓仁县桓仁街西门里。以前是一个庙宇，日寇进入桓仁后，是日本领事馆的馆址，后为协和会办公地点。协和会桓仁

县本部本部长是伪县长刘清一兼任，副本部长由副县长日本人石垣兼任。实行所谓“二位一体制”即伪县公署和伪协和会同属一个系统，两个机构。本部内设有事务长一人，由日本人担任，专职负责伪协和会事务。下设总务班、指导班、青少年班。另有“妇人会”、“军人后援会”两个外围组织。青少年班下设“青年训练所”，专门训练青年做为青年一代的骨干。在基层按行政区划设十八个分会，桓仁街分会长由伪街长杨春华兼任；二道岭子分会长是伪村长董某兼；横道川分会长是村长王绍通兼；沙尖子分会长是村长王芝田兼；五里甸子分会长陈晓江村长兼；六道河子分会长是村长孙廷双兼；二户来分会长是村长王禹川兼；华尖子分会长是村长黄义忠兼；木盂子分会长是村长袁裕民兼；四平街分会长由村长荣尚义兼；八里甸子分会长刘某专职；普乐堡分会长由村长魏永秀兼；雅河口分会长由村长姜春湖兼；泡子沿分会长由村长潘某兼；拐磨子分会长由村长马忠礼兼；业主沟分会长佟某兼；响水河子分会长由村长曲元伯兼；北甸子分会长由村长陆某兼。

（二）县协和会职权范围

1、宣扬建国精神。利用各种集会，在基层农村协和分会和学校进行宣讲，大讲特讲日寇帮助成立伪满帝国的大恩大德，老百姓应饮水思源，感恩图报，以利日寇的统治，宣扬“王道乐土”，伪满建国的远

景，做到日满协和，日满团结，日满一德一心，人人应忠君爱国，为建设伪政权尽忠效力。

2、宣传宣抚工作。宣传工作是协和会的日常工作，有关伪满的施政方针和各项政策，事先由协和会组织宣传班、宣传团带领放映队到基层农村分会所在地进行宣传讲解以利推行并搜集地方情况。下边如有情况带回来，召集协和会县本部委员会议，予以答复和解决。协和会本部委员会是协和会的权利机构，委员会的委员都由协和会推选，由桓仁县的各机关单位首长和地方士绅组成。每月定期召开一次会议，有必要时可召集临时会，召集人是协和会事务长。宣抚工作是地方发生灾难时由协和会组织慰问团进行发放救济品，这就是所谓的"满洲德政"。

3、设立青年训练所，组织和奴化青少年。由农村选拔一些身体健康，并具有中学或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到青年训练所受训，期限半年，内容有军训，时事讲课，建国精神教育课等。军队派军事教官上尉一名在青年训练所长期驻在，专门上军事课。学科由县本部正副本部长，县本部委员等人轮流上课。具体负责人是荻山（日本人）和康建章，都在青少年班做专职正副班长。受训毕业后，学习成绩好的，给介绍职业，其余学员回基层在分会作为骨干分子，边参加农业劳动边义务为分会做事。

4、军人后援会。这个组织负责对应征入伍的伪

满国兵家庭进行调查，发给家属“国兵之家”等牌证。

5、妇人会是妇女组织。日本妇女较多，中国妇女只限于少数官太太们，没有什么重要活动，只是参加集会，有时进行家访，表现日满协和、日满亲善。

6、调停委员会。主要调处民事纠纷，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如离婚、债务、土地争讼案先交由伪协和会调停委员会调解。组成人员由协和会选派，法院派人参加。

7、县联合会，简称县联。这是一个大型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会期三天，参加人员一部分由协和会分会选派代表，另一部分由县本部指派。会议期间以各代表提出议案为主题先由代表陈述意见，然后由各主管部门和单位负责人进行答辩，能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将议案交给县本部委员会与各方面联系后处理。这个会很隆重，都有伪中央和省级要员参加。桓仁县各机关各单位负责人都必须亲自到会，对有关单位的议案负责说明。另外县公署法院、检察院、税务局、银行、兴农合作社、交通公司等机关都在这个会上做“施政报告”和“工作汇报”。这个会的目的对外表示民主，尊重民意，对内意图把全县各机关所担当的工作纳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以便日寇统治东北更心得手。

8、“协和会桓仁县本部委员会”这是伪协和会

常设机构。每月至少开一次会，多则两次、三次不定。因为委员大部分都是各机关的头头，利用开会的机会，互相见面，藉以解决县联和县本部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对伪满政权的方针政策的宣传都在这个会议上做出决定，交协和会汇同有关机关去贯彻执行。如要出荷粮、征兵、勤劳奉仕、筹集国防献金等都交由协和会去主办·

伪桓仁县公署，就是县里最高行政机关。日本人副县长，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县长是牌位、是傀儡，从行政系统来说，他只能对县公署各科股发号施令，不能对其它机关插手干予。因此，藉伪协和会这个标榜民意的组织把所有的大小机关和单位的头头都网罗在一起，由日本人副本部长随意摆布，既可以独揽大权又可以显示民意，这是日寇对伪满统治的招法。其实日本人在桓仁县干了许多坏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为了剿灭抗日联军施行间壁清野，归屯归村，烧了多少家老百姓房屋，使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为了镇压反满抗日，清剿思想犯，在桓仁县教育界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报国会事件”从教育局长邱占元，农务会长孙玉山、桓仁师中校长李德恒起，进行大逮捕大搜查，关进监狱达四、五十人，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死难者三十多人。残酷杀害，令人发指，是可忍孰不可忍，亡国的教训，终身难忘。其他如要出荷粮，逼得老百姓饥寒交迫，实行统

治经济，配给制度，不但老百姓无法生活，既是公务员也不得温饱。中国人吃细粮，就是经济犯；谈论国事，就是政治犯。所谓日满协和，日满亲善，是欺骗中国人的花招。回想往事，至今我余恨未平。

对伪满柞蚕株式会社桓仁出张所的回忆

宁书绅

伪满柞蚕株式会社，是日伪资本家以伪满洲国的名义，设立的柞蚕生产组织。通过这个组织拢断柞蚕的生产和茧丝的利用，牟取暴利，扶助侵略战争的需要，为伪政权、日寇统治中国人民效劳。

伪满柞蚕株式会社本店设在长春(当时为新京)，下设奉天（沈阳）、安东（丹东）两个分店。对有柞蚕的县分设柞蚕株式会社出张所。我县是一九四〇年秋成立的，名称是："柞蚕株式会社桓仁出张所"，隶属于安东省柞蚕分店领导，历经三任日本人所长。

我于一九四〇年冬从伪桓仁国民高等学校毕业，一九四一年春由学校介绍到桓仁柞蚕株式会社驻在所当临时庸员。当时只有七、八个人，除了所长家入辉雄是日本人以外，都是中国人，刘云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地点在现在的食品加工厂院内西厢房。

我到该所不久，日伪为了加紧对柞蚕丝绸的拢断，又从社会上招集一些人员，扩大到十三人。这

时又来了一名日本人叫细谷孝，做行政事务工作，是家入辉雄的助手。办公地点迁到现五金公司东侧门市房。秋季又搬到现食品公司大院内。改为柞蚕株式会社桓仁出张所，又派日本人幸日出生，代替家入辉雄的所长职务，职称为书记。

出张所根据当时放蚕区域的大小，下设桓仁城、普乐堡、沙尖子、拐磨子、二户来等五个柞蚕收买所。每个所三至五人，由一名中国人当所长（为雇员）。桓仁城所所长张跃先；普乐堡所所长刘云；沙尖子所所长赵云飞；拐磨子所所长于远惠；二户来所所长钟铁成。我在出张所所内做事务工作。

桓仁农民放养柞蚕历史悠久，特别是放养秋蚕，气候适宜，有蚕场的地区和有放养技术两个劳动力以上的农户（蚕民），一般抽出一个人放养一把秋蚕，作为家庭副业收入。当时桓仁县共放养柞蚕一千五百把左右，多的年份超过二千把。桓仁城、普乐堡两个所为多，达四百把左右；拐磨子、二户来为三百把；沙尖子则在一百把左右。当时在柞蚕收购上虽然残酷的剥削农民，但为了鼓励柞蚕生产的发展，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吸引农民放养柞蚕。到解放前两年物资奇缺时，规定放一把蚕奖给一双胶鞋、若干斤粮食；每卖五千粒奖给七尺白花其布等。尽管如此，到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柞蚕放养面积仍停留在二千把左右。年总产量为六万千粒，一般年成平均单产三十千

粒，丰收时每把秋蚕可收四十至五十千粒。

收买所的任务是，指导放蚕收购大茧，运到桓仁出张所加工茧丝，向上级交售，拢断柞蚕业的生产与销售，从中牟取暴利，剥削中国人民。当时在出张所北侧、公路西侧设有一所挽手加工厂，招集雇用老匡丝工人三到五人，带领从社会上临时用的姑娘和年轻媳妇，加工挽手。加工完了散伙回家，下年加工期间再重新雇用。加工成挽手后，打成包装运到外地再加工纤维和成品。从蚕茧收购看，是以质论等，以等论价。等级标准，以一千粒重量为依据，分一至五个等级，不够等级和揉烂茧为等外品，每千粒不值一元钱。一般年景以二、三等茧为多。当时二等茧收购价格每千粒为四元五角。

桓仁出张所的机构和人员变化，是很频繁的。一九四二年春又增加两名日本人：一是永田清太郎，日本蚕业专科毕业生；另一名是从桓仁县兴农合作社（对柞蚕株式会社桓仁出张所是指导关系）调来的，叫高城源吾。这两名日本人职称都为书记。一九四二年秋，日本人的职称改为职员；收购所改为分所，分所长为准职员，一般的为雇员。一九四四年秋，我被调回家乡二户来当柞蚕分所所长（准职员）。原分所长钟铁成调到桓仁城当分所长。一九四四年冬，幸日出生所长被征兵调走，又调来鸟羽××当所长。到一九四五年春，永田清太郎、高城源吾，先后回日本

国。后来细谷孝也调走了，有时还来桓仁监督检查工作。鸟羽所长等几个日本人，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前几天就已经偷着离开桓仁。柞蚕株式会社桓仁出张所，随着日本投降而解体。我们在农村的柞蚕分所的人，也都解散回家了。

（张成礼　整理）

日本桓仁“开拓团”始末

县公安局供稿　　张成礼整理

伪满时期，日本国曾派大批农民开拓团来我东北各地。依仗特权势力，用极低价格强制收买我国农民耕种的好地。名曰“开拓”的农田，实则是民族开拓，以达到巩固侵略的地盘，扩展其国土与民族之目的。

在桓仁的日本开拓团，是一九四○年春建立的。该年二月份，先后分三批，从日本国本洲岛北部西海岸的秋田县，迁来农民六十户、二百六十多人口，到普乐堡定居种地。

开拓团总团部设在普乐堡村所在地原大地主胡殿臣（胡顺武）的四合院内，即现在普乐堡中学的位置。六十户的分布：团部院里二十户；距团部东南百米处二十户；距团部以东一千米处的牛毛沟二十户。

团部设有团长、副团长、生产主管人、会计和医务所、学校等。团长夏井永吉，四十岁左右，大学生，识中文通英语，未带家眷，每月工资二百元左右。副团长夏村，大学文化，有妻子和一个女儿，每

月工资一百五十元。生产主管人叫一嫲某啦（后升为副团长），带有妻子、儿女，月工资八十元左右。女医生兼会计稻叶，当时未婚，是该团木匠川奇的女儿，每月挣六十多元钱。小学教师柳川，与另一名教师，教四十五名学生。其他的人均为农民，生活供给制，不发工资。

开拓团所耕种的土地，是在开拓团到来之前，由县公署的日本人出面与实业科官吏一起，先选好地形，定出地块，量清亩数，再找地是谁的，通知其必须卖地。并且立下契约，限期交地。如过期不交出要买的土地，即按反满抗日思想犯论处。

用上述办法，共征用普乐堡、胜利、牛毛沟部分住户的好地一千五百余亩（水田八百亩）。耕种品种有：水稻、玉米、大豆、高粱、荞麦、土豆、蔬菜等。耕作方式与中国大体相同，每年粮食产量约四十万斤左右。因为地多、劳力少，他们只耕种水田，农忙时还雇用邻近农民打短工。旱田全部出租，日本人吃租息：开拓团根本未开垦过什么耕地。

作物收获，除按人口定量分配够吃的粮食外，剩余部分全由团长支配或卖出荷粮。农民不挣工资，只享受低水平的供给，如棉布、鞋、煤油、大酱等少许劳动奖酬。

一九四一年二月，从普乐堡总团中，拨出十八户农民，集体迁到二户来村的龙头定居，建立龙头开拓

分团。

龙头开拓分团，隶属普乐堡开拓总团领导。在经济上与普乐堡总团一体化。夏村为分团长。下有主管生产的叫大高武郎，有母亲、妻子、两个孩子共五口人。还有一所小学校，一名教师教二十名左右学生。

龙头开拓团位置，在二户来村龙头山的东南面。即拉古甲干河以西、黑卧子大河以东的大片土地，水旱田三千余亩。耕地是县公署的日本指导官与二户来村长等人，以低价办理的买卖手续。水田每亩六十元，旱田每亩四十元。房屋是经过县公署、开拓团长等人，下令逼迫原住户无代价腾出给他们用的。原住户无耐于正月初二搬家给开拓团腾房子。住房旧址，于一九五八年全部拆毁无存。

龙头开拓团共有水田一千亩，旱田二千亩。水、旱田年总产量为一百四十万斤左右。经营品种有水稻、玉米、大豆、荞麦、土豆、蔬菜等。他们自己只耕种水田，农忙时雇短工。旱田分给各户，再由各户出租给附近的中国农民种，日本人吃租息，从中剥削。所有收获全归团长支配。口粮从自种的收获中按人口定量发放，剩余部分由团长卖出荷粮。

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侵占地盘多，国内兵源奇缺，不得不大量动员兵员。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上半年，普乐堡和龙头的日本开拓团中的男性青、壮年有百分之八十被征兵上了前线。从田间劳动

时可以看出，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男性老弱者在地里干活，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

日本在桓仁的开拓团，从一九四〇年二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历时五年七个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而解体。普乐堡开拓团团长夏井永吉，于投降前五十天就逃之夭夭。其余成员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十二日上午九时许，乘坐临时调去的马车送到桓仁镇江北集中；二户来九头开拓团的成员，也同时由伪村长派大马车，并有伪县公署派的两辆汽车载着日本守备队护送到桓仁镇江北集中。然后，经通化回国。

桓仁卫生事业的兴起

李 源 训

我是一九三一年到桓仁县城，在自厚生药房学徒，从那时到“九·一八”事变后的伪满时期，从“八·一五”到解放后的新中国，我在桓仁从事卫生医药工作五十多年了。回顾这五十年的历程，随着各时期的社会制度变革，桓仁县的卫生事业，也随着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旧中国的桓仁城

一九三一年县里是座土城，在东、西、南有三个城门，北门已经堵死，城的中心是县府衙门。据说，桓仁是八挂城，九连灯，但当时只在县衙里长挂着一盏红灯。县衙里修了一座狐仙小庙，这盏红灯，就挂在庙侧竖立的高杆上，有专人负责，每天晚上点灯。传说，这灯一天不点，就要发生双头案件。城的东门里修的城皇庙和关帝庙，南关修的天后宫庙，城里谁家死了人，每天三次要到城皇庙烧香烧纸。每年阴历四月十八日，是天后宫的盛大庙会。每到这天，

烧香的、还愿的人拥挤不透，十分热闹。人们把求吉利、求福寿、祛疾病、消灾难，寄托在菩萨和神仙身上，所以医疗事业是很落后的。当时只有三家私营的华济医院、同升医院和信治医院后改为汝舟医社。每家只有医护人员五至十人。那时只有同升医院的刘同升大夫技术较好。有一次华济医院请他做了一次剖腹产，医院向患者要了手术费六百小银元。可想而知，穷人有病是治不起的。中药业有永和长、自厚生，两家较大的药房，能自制丸、散、膏、丹。在县内批发零售个人开业的有人术堂、春和长、中兴福三家小药铺。农村只有沙尖子、横道川、五里甸子、华尖子、二户来、八里甸子、普乐堡、拐磨子、业主沟这些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共有十几家个人开业的小药铺。全县中西医务人员仅百人左右。在医疗方面，主要依靠中医中药。

当时的县衙门根本不关心人民疾苦，不抓卫生工作，群众缺乏卫生知识，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由于群众生活困难，无钱求医买药，只好求神许愿，任凭巫医大神欺骗。尤其是那些旧产婆，不懂科学知识，接产时把炕席揭开，让产妇在土炕上分娩，用高粱杆割婴儿脐带，很容易感染上破伤风菌，婴儿几天后就抽风而死，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七天风、八天扔”。产妇得了产褥热，较轻的作下了月子病（腰、腿痛）重的造成死亡。加上天花、麻疹等传染病，年年

流行，严重地摧残着妇婴的生命。华尖子有个老宫太太，一辈子生了十三个孩子，最后一个也没活。所以那时的人口增长缓慢。

社会风气不良，也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桓仁城里有四家娼妓院，即东门外有朝鲜“料理店”，在小河沿有“满洲料理店”，供日伪军政人员行欢作乐。这些妓女都患有梅毒、下疳、淋病等花柳病，不少的人感染上了这种病。农村私种大烟，商业可把它当商品做交易，社会上的权贵人物，可以用鸦片招待客人，好多富豪士绅，池富子弟，因抽大烟成瘾，倾家荡产，走上歧途。广大贫苦农民，受生活疾病折磨，体质衰弱，所以，外国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二、伪满时期的卫生事业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一九三二年，日军侵占桓仁以后，把桓仁视为重点匪区，进行残酷镇压。在农村强迫散居农民归屯；在城镇，日本宪兵大抓思想犯。城乡居民，人心慌恐，生活困难，企业萧条，卫生事业更不例外。同升、华济两家医院相继倒闭。其它诊所和中药业，免强维持现状。从一九三三年，疟疾、斑疹、伤寒相继流行。斑疹伤寒是虱子传染的一种传染病，得了就是一家，群众叫“窝子病”。一九三五年春，武家街的西荒沟，因得此病，死了很多人，来不及做棺材，用大柜装尸体往外抬。

到一九三八年前后，医药卫生事业逐步有所恢复，城里中药业增加了怡庆堂、六合春两家药房，西药增加了玉川、龟山两家朝鲜人开设的个体医院（实际是诊所），还有大林、济生医社，县设立了公医院，有西医师一人，都称黄公医，共有护杂人员五、六个人。这个公医院很少给群众看病，实际上是伪满的卫生机关。中医改称汉医，由民生部大臣孙其昌发给汉医证书，（医师认许证）；中药业发给营业执照，（中药业完全纳入商业管理，药铺名堂被称为××商号）缴纳所得税。那时医药技术各自保密而不传，当成发财资本，很多验方秘方流落失传。

康德元年，佛教会在北关修了一座佛堂，县行政科长吴恩广嫌佛堂没有佛像，让群众捐款，重新扩建。增修了释迦牟尼、玉来佛、观世音菩萨、十八罗汉等佛像，招收僧妮二十余人。他手拿念珠也参与念经，走到关帝庙前，总要向庙行礼。有一年天旱无雨，他招集群众，结成队伍，头带柳枝，沿街到各庙跪祷祈雨。在他的影响下，群众的迷信思想相当严重，巫医大神遍及城乡，有病有灾，求神讨药的人越来越多，医疗卫生状况自然不好。

由于伪政府不关心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相信科学，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仍然缓慢。到伪满末期，桓仁的医药人员仅有一百四十余人，中医中药人员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西医为少数，城乡医疗卫生事业，仍

是中医中药为主的形势。

三、解放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情况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八路军接收了桓仁，宣传贯彻共产党的政策，人民政府的法令，向封建迷信思想展开了斗争。扒掉了县衙小庙，摘下了红灯，解散了韩满两家“料理店”，妓女都各找生活出路。专为日伪服务的玉川、龟山医院也倒闭回国。佛堂、天后宫的佛像也先后拆除，僧侣、尼姑也各找对象，安排了职业。尤其是那些吸鸦片扎吗啡的人，在土改运动以后，由于政府禁止种植大烟，卫生部门加强了麻醉药的管理，杜绝了鸦片、吗啡的来源，使这些人不仅忌了吸毒，而且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号召繁荣经济，自由贸易，市场活跃，地主投资开设的医药业开始分化。一九四五年冬，自厚生药房倒闭，分成东自厚生、西自厚生德生厚、厚生福、维新五家小药房。一九四七年土改时，永和长、怡庆堂两家大药房，改为公有。一九四八年，县成立了济桓医院，聘请齐大林为院长，大夫有胡继辉，以后济生医社的王汝霖大夫到院做了内科医生，当时医护人员共五名。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东省在通化地区，进行中西医师考试，桓仁去参加考试的七十

余人。考试结果，考取西医师甲等限地医一名，(注：限地医就是仅限于通化地区，其他地区不承认，再经考验由省或中央发给医师证书时，国家才承认为医师因为上述人员根本没有医师认许证）是胡吉辉；乙等限地医中医师五名，是于书焕、李源训、王成功、胡舜五、吴子峰；丙等限地医中医师十名，是张子良、沈绍庚、吴国权、高殿贵、左同光、宋成良、张介民、侯青云、徐其祥、杨占东；换发西医师证书的有齐大林，王汝林、李仙洲；换发中医师证书的有邵延令、野逢春、郭旭昌、臧士贤。(注：换发证书的，均系伪满时期有民生部大臣，先是孙其昌后是于静远名义发给的医师认许证的)。

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卫生科，第一任卫生科副科长王兴国。卫生科把以上人员，列为卫生战线的骨干力量。济桓医院增设了中药门市部，负责全县中药批发业务，聘请杨占东为坐堂医，于一九五一年改为中医门诊部。当时中医师有张子良、邵延令，培养中医徒弟二人。济桓医院一九五一年改为桓仁县医院，增设了病床三十张，医护人员增加到三十六人。

一九五〇年成立了东北卫生工作者协会，本会宗旨是："为团结东北区中西医药卫生人员，展开政治与技术学习，提高思想和技术水平。以予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各级人民政府卫生机关的指导下协助执行卫生政令，进行防疫、保

健、医疗等各种具体工作，以增进劳动人民的健康。五〇年五月，县成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桓仁县分会，齐大林任主任委员，吸收会员一百六十八名。其中：西医三十三名，助产七名，中医中药一百一十七名，镶牙十一名。

为了提高医务人员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县里成立了业余学习班，组织中西医药人员每晚学习两小时。在县卫生科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和思想教育，这些个体的医务人员，逐步克服了保守思想，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毛主席提出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思想。从五〇年起，这支队伍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全民免费种痘高潮。此后，年年按规定给儿童接种牛痘，从而使严重危害儿童生命的天花传染病，在我县绝迹。

五一年八月至五二年四月，先后动员了十三名中医八名中药人员到农村，建立了十三个合作性质的卫生所。各路的责任医：马圈子是连文生；二道阳岔是梁宝长、梁月文；五里甸子是张医珍、张俊仁；影壁山是崔子稔；北甸子是冯正修、冯士恕；大川是殴士杰；县沟是翟明楼；铧尖子是赵洪儒、韩九功；四道河子是高殿贵、危雨浦；木盂子是于书焕、于忠山；湖头是孙万玉、魏士祥；洼子沟是金凤寿；联合是胡舜五、张裕民。卫生工作者协会，又在各老中医等会员中，发起献方活动，共收集验方秘方三百余个，编

印二百余册，分别发给会员临床选用。

一九五四年成立了妇幼保健站，副站长于振英。妇幼保健站加强了妇幼保健工作，训练接生员（当时叫改造旧产婆），实行新法接生，对孕妇进行产前检查，产后访视，宣传妇幼卫生知识。通过新法接生，基本杜绝了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月子病）的发生。同时，对妇女儿童病开展了普查普治工作，着重治疗妇女子宫脱垂，阴道疾病、儿童营养不良、蛔虫等疾病。由于狠抓了妇幼保健工作，全县儿童出生率逐年增加，建国以来，人口猛增。

一九五六年，县成立了卫生防疫站，站长丁克任。在县卫生科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兼爱国卫生运动工作。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开展了对疾病的普查普治工作。首先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梅毒、下疳等花柳病，进行免费治疗。由于社会上没有娼妓传播，使这个病得到根治。

一九五六年，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根据不同的季节，春季开展挖蝇蛹，清除粪便垃圾，大搞环境卫生的突击活动；秋季开展以灭蚊蝇为主搞好饮食卫生的突击活动；冬季开展以灭鼠为重点予防冬季传染病的突击活动。为了改变农村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无厕所、禽畜散放的不卫生习惯，爱委会提出了“五有”，要求人有厕所，鸡鸭有架，猪有圈，牲畜有棚，水井有裙

益。首先在东老台搞试点，取得经验，在全县推广，使农村卫生事业面貌明显改观。

一九五六年，在合作化运动基础上，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永和长、怡庆堂两家大药房的[illegible]人员，都参加了国家经营的医药公司。私营的个体中西医务人员，一部分参加国家和集体的医疗组织，一部分参加其他革命工作，全体卫生工作者协会会员，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卫生工作者协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此，全县的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医疗队伍逐渐壮大。至一九五八年，大队建立起卫生所六十个。公社化后，全县建立起地区医院四所。公社医院九所。到六六年除社有医院外，在一百四十三个大队建立卫生所九十七个。

日本法西斯走狗—兰仁居

赵 伟 宋玉峰 搜集整理

兰仁居，别名兰景安。原籍桓仁县二棚甸子村。此人当时圆脸，身材较高，是个胖子，四十多岁。在旧中国曾任新宾县东昌台区官，“九·一八”后又当了伪警察。先在二户来警察署当主任，由于他积极效忠日寇，从一九三六年农历三月提升为铧尖子警察署署长。在他任署长的不满二年时间里，更是无恶不作，心毒手狠，杀人不眨眼，群众恨之入骨，背地都管他叫“兰扒皮”、“兰豆包”。

兰仁居当了伪警察署长后，经常逼迫群众去修围子、修国道、砍树、出探、站围子。老百姓对这些数不尽的“官差”稍有怠慢，就会遭到兰仁居的处罚，他除了打骂以外，还经常用罚站、罚跪等手段折磨广大无辜群众。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修红塘石一段公路时，因群众去的晚了一点，兰仁居痛骂了一顿后，还逼罚董世全等七、八人到刺骨的凉水中站着，致使这些被罚站的人腿都冻坏了。在归屯时，兰仁署把老百姓逼去修围子，从秋修到春，修完这处修那处，由

于吃住条件不好，挨饿受冻，活又累，折磨死不少人。特别是在修外三保时（后划归本溪、新宾县管辖），情况更惨，人们吃不上盐，吃不上菜，下雨时又挤住在漏棚子里，不少人得了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兰仁居带领警察举着鞭子逼着干活，结果有三十多人经不起冻、累、饿的折磨死在那里。人死了很长时间，家中才知道。到了春耕的时候，也不放人回家种地。各家都是妇女、小孩和老年人在家，只好采取往原垅上按种的简便种法，造成当年粮食严重欠收，第二年生活就更加困难了。

兰仁居所以有兰扒皮这个外号，就是他打人太狠了，他打人一般不用手直接打，而是拿着大板子打，用马鞭子抽，甚至双手举着赶车的大鞭子抽脖子。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修铧尖子围子时，韩相臣等人站起来往北望，看兰仁居和警察来没来。哪知道兰仁居从南边来了，看到他们伸起腰不干活，就用大鞭子逐个抽打，把韩相臣抽得全身发青，一直养了半个月才能下地劳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警察署派房正红出探，说房探的情况不实，把他交给探子房，兰仁居命令警察、保甲把房的裤子扒到脚脖上，兰用板子，棒子一顿毒打，把布衫都打破了，把房打的不省人事，两个人掺着送回家，一个多月才能下地。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阴历）修铧尖子围子时，天很冷，水都冻得结冰碴了，谁也不愿下水干，兰仁居发

现后，一顿马棒把民工都打下水了，都被冻得半身麻木。

在一九三六年归屯时，兰仁居带领警察把山沟里农民的房子都烧了，强行将农民赶进指定的围子去住，目的是断绝抗日联军与农民群众的联系。在烧房子时，有些农民苦苦哀求，等拿出被褥和东西再烧，兰仁居却训斥说："早干什么啦？点火烧！"结果全被烧光。据初步统计，仅铧尖子警察署管辖内就有三、四百间民房被烧毁。

兰仁居在任铧尖子警察署署长期间，对老百姓非打即骂，更甚者常以通匪罪名杀害无辜百姓。在桓仁县各警察署来说是最多的，也是最残忍的，许多农民全家遭到杀害。铧尖子庙后沟的"万人坑"就是兰仁居一手制造的。

川里农民李春阳全家七口人，一九三六年归屯时，因家穷人多，到铧尖子无法过冬，便在谷草垛沟修一个临时窝棚（原房被警察烧掉），被密探发现后报告"兰豆包"。当天晚上，"兰豆包"就带领警察和保甲包围了李家的窝棚，把全家人抓起来，放在场院里，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死，除六岁男孩被白警尉要去当儿子，其余六口全被杀害。兰仁居看李春阳妻肚子大怀孕了，便用刺刀将肚子豁开，婴儿从腹中蹦出，残不忍睹。碑登的程绍清家四口人，曲老王家六口人，王某某家两口人，由长东等四家共十三口人，

除程绍清妻被孙某保出为妻和曲老王家保出一个小孩外，其余十一人都以通匪为名被杀害了。“兰豆包”动不动就骂老百姓通匪，甚至在家里也经常骂他老伴“通匪”。

一九三六年某日，兰仁居派特务刘清连、兰孝东夜间冒充红军，到高台子试探群众思想。打听谁给红军齐粮、送粮，群众误认他俩为红军，说了真话。当晚两个特务回去向兰仁居报告，次日，兰仁居亲自带领警察、保甲，把这些说了真话、给红军送过粮的三十多名群众，抓到铧尖子警察署，一次就杀害了十几名。木盂子村马圈子沟的周巨发、李成矩，被以通匪的罪名抓到铧尖子警察署，将周巨发活埋，将李成矩头朝下装进大水缸里活活灌死。

兰仁居还常带领警察、保甲到文治沟、窦家等地，对不愿归屯，散居在地窨子里的农民，以通匪的罪名，有的被抓到警察署，有的被当场打死后，用铡刀把头铡下来抬回，悬挂在铧尖子村东门外大杨树上示众，最多的一次就挂过七个人头。

兰仁居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但老百姓恨之入骨，在他的上下（除日本人之外），也不得人心。一九三七年农历十月，铧尖子孟广尧等三名士绅联名，写了“黑呈子”（密告信），其内容是：第一条，兰仁居送给红军七支步枪三箱子弹。（一九三六年红军通知兰仁居，要保命必须给红军送枪。不久，红军夜

洞包围了锌尖子警察署。红军喊话："你们要不把兰豆包送出来，我们就冲进锌尖街，毁掉警察署"。兰仁居见势不妙，为了保命，偷偷派人，送给红军七支"七九"步枪和三箱子弹。红军即刻撤走了）第二条，贪污县警务科发给被红军处死的密探款二百四十元（县警务科，对被红军或土匪勒死的密探，每人发一百元养家费。但兰仁居只发给八十元，他贪污二十元，共十二个人）。这份呈子，经警务科金主任转递到县公署，不久，"兰豆包"被罢官，并包赔全部赃款。然后回家，在二棚旬子赶马车十年。一九四七年三月，他为了逃避人民讨还血债，随国民党桓仁保安团逃至沈阳。一九四八年秋沈阳解放后，下落不明。

交通史上话第一

——《桓仁县公路交通简史》摘录

张成礼

桓仁县位于辽宁省东部边陲，历来均属辽宁管辖。据历史资料记载和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证明，三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和勤劳的各族人民就世世代代生息在此沃土之上。他们聚居浑江两岸，从事狩猎和男耕女织的生产活动。

桓仁县始建于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清朝、民国、伪满时期，公路交通建设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建国后，交通运输和公路建设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在境内有县级以上公路七条三百一十六公里。其中：国道鹤旅线公路贯穿南北八十九公里；省道木通线公路贯穿东西为一百四十五公里。初步形成了以国、省公路干线为主，干支相速，乡乡村村通汽车的公路网。

桓仁山区，无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命脉，它对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关系极为密切。迄前清及民国时期，桓仁无一条畅通的道

路。日本侵略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为了达到军事侵领与经济掠夺的目的，把交通视为命脉，强迫群众修筑所谓“国道”、“警备道”，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九年是日伪在桓仁大量修筑道路时期，至解放前夕，先后修筑国道五条、县道二条、警备道六条，可通汽车道路一百九十三点五公里。有乡路（不能通汽车）六条一百六十一公里。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使全县交通运输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基本可分为三个时期：五十年代，着重依靠群众养护、维修、恢复原有公路；六十年代建立起公路管理机构，增设专职道工，加强了干线公路养护和建设，修建了本桓公路高俭地路段和大中小永久性桥梁二十一座，修乡路三条七十七点六公里；七十年代以来，主要对本桓线、桓泡线公路建设黑色路面七十八公里，在鹤旅线、木通线、本桓线上建设大中小永久性桥梁二十六座、一千零九百六十延米，修筑乡路六条八十四点九公里。现在全县公路总里程五百八十六点四公里，为解放前的三点三倍。公路运输的发展，为改变山区交通落后状况，为开展山区资源，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桓仁县公路交通简史》已由桓仁县交通局编印在册。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尊重史实，秉笔直书”的原则，作了详尽的记述。为历史科学研究，使后人继承我们的

遗产，造福人民，"为四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做了有益的工作。仅从《简史》中摘录六段名人轶事，从文史角度颇有价值。

第一条山道开创人

——首任知县章 樾

清朝时期，桓仁交通极为不便。主要是人行道、驮道、短距离的马车道。二十世纪初，由于外来迁住人口逐年增多，开发农田，增产粮食。因此，极待解决粮食外销问题。当时县城与二户来、铧尖子、拐磨子、横道川、沙尖子、普乐堡等主要村屯，因其周围被山岭江河所阻，只能在冬季江河封冻后，各地马车可由土道经江河冰道将粮谷、农付产品运至县城销售。而县城外运，只有由沙尖子至安东的水运。而县城至沙尖子需经头道岭、二道岭、四道岭、影壁山四座山岭，并无通畅道路。

桓仁的第一任知县章樾，河南人。此人治县辛勤，关心疾苦。他以"便民、便通商、便利赋"为据，日夜筹思开修经影壁山直达丸都（今集安城）的县内大道，为民造福。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章樾乃召集雍和、熙和二保民众百余人，开山凿岭运土搬石。他亲登大岭监工抚众，食宿于民夫之中。开修这样的大岭本来就困

难重重，然一到寒冬就更加艰苦了。他吝惜民众道：“塞外无日不飞雪，征夫十指九冻裂。”而盛夏到来，虽说得了手脚，可不幸的事竟意外地发生了。那些被石碰伤划破的人，伤口个个染化为浓疮，继而漫延开来。不得不停顿工程，以寻方医治。据民国时期《桓仁志》（四）文艺志四十九页“修大岭记”中记载：“……惟缘山而北，由横道川绕经东南行至影壁山，右支略坦，觉可施方，路际，又迤东为挂牌岭，逶迤相接，时冲二保合修，筹支亦如之……计去秋兴工，未几冻合，不能刻期奏效，今春急督民匠凿石开道，俾通车马而后已……”从历史记载可以了解，当时头道岭、二道岭、四道岭已有简易车道，唯因受影壁山岭之所隔而路不畅通。是章知县责令当地乡保民夫修通影壁山岭并几经整修，从而开辟了桓仁县城至沙尖子第一条山岭道路，人们赞之为便民道。此路修通，解决了桓仁县有史以来有粮无处售，有路不畅通的局面。县内的粮谷绝大部分可以通过此路运至沙尖子，然后经浑江、鸭绿江运抵安东销售，给山区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方便，成为县内一条主要运输干线。相距数百里的柳江、八道江、通化一带的马车，也通过这条道路向沙尖子运粮，最繁忙季节日行车达千辆。

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又修道“石头峦盘岭”山岭道路。此处系二棚甸子与沙尖子管辖交界，崇山峻岭，山高林密，车马不通，徒步难越。为打道

山岭，光绪十五年，由当地“主持道”（老道）徐园志，将自己多年所筹资金，用在本岭修建“万清观”庙宇，同时大兴修建“石头峦盘岭”道路，共花费8,300余吊资金，历时一年多基本建成宽四米长五华里的山岭道路。从此，由桓仁去往沙尖子的马车，大部分路过此岭经头道阳岔去沙尖子，比走影壁山岭近三十华里。山路虽不称好，但在当时能方便道车，可以减轻人挑马驮的笨重劳动，是一条便民之路。而修此道，工程浩大艰巨，一无技术，二无设备，全靠手工劳动修通山岭道路实在不易。当地群众称此“老道”是为民造福的英雄。（有石刻碑文为证）

第一条公路组建者

——辽宁民众自卫军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后，辽宁各地爱国军民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武装反抗。唐聚五在桓仁成立“辽宁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自卫军在桓仁等地驻有重兵，与敌人进行战斗，抗击侵略者。

在内忧外患煎迫下，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不仅有了自己的乡村自然小道，而且也开通了连接无数乡村和城镇道路。由于当时政治、经济、技术条件有

限，我县与邻县新宾交界的丫头岭、老道沟岭，与宽甸县交界的坎川岭、高力盘道岭，没有公路，仅有当地群众互相往来形成的人行道、驮道，不能通行马车。一九三二年八月“辽宁民众自卫军”在通化总部成立辽宁抗日省政府以后，老百姓主动帮助“自卫军”修筑了由桓仁到通化全长一百八十华里的公路。以便各路自卫军和总部的联系。桓仁与通化交界的缸山岭亦在此时修道道路，可以通行马车和汽车。这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公路。

第一辆来桓汽车的主人

——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

有史以来，在桓仁境内道路上行驶的第一台汽车，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在桓仁召开誓师大会，唐聚五总司令由通化乘一辆黑色轿车来到桓仁的。

桓仁县有汽车的历史，是伪满桓仁县公署购进第一台日本产的汽车（货车）。尔后，相继建立了桓仁至通化、安东至桓仁、桓仁至南杂木路线的汽车营运，包括客、货运输营业。汽车营运路线和交通工具，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汽本司机全是日本人。一九四〇年（康德七年）日本人在二棚甸子开发铅

矿，每天有五、六十台汽车向通化火车站运送铅粉，桓通干线运输繁忙。一九四二年，日寇为了加紧对"东边道"的统治和修建水电站的需要，强制群众出"劳工"、"勤劳俸士队"，修建由北甸火车站经木盂子、桓仁沧子沿至通化的火车道，并完成基础和土石方工程，打通了双岭子、丫头岭等隧道，直到日本垮台未修成。

第一座石拱桥资建者

——开明人士马富

居住在桓仁城北岭处，有一位全县闻名的能人马富。他为人民群众的公共福利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一九三九年五月，他自筹资金在城内三道街小河沿上，雇用能工巧匠，用近一个月时间，修起一座长四米、宽三米五、高二米白灰砂浆的石拱桥。这是我县出现的第一座石拱桥。它方便了过往行人和车辆通行，深受群众好评。后来群众都称为"罗锅桥"，直到一九七九年桓仁镇三道街修建黑色路面时，才被拆掉变为永久性钢筋混凝土桥。

第一架民用班机通航

——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桓仁出张所

日本侵占东北后，于一九三二年在奉天成立了“满洲航空株式会社”。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由日本关东军驻桓仁的守备队监工，在桓仁城西关占用民地，用百姓赋役的办法，修建一处飞机场。机场长约七百米，跑道六百米，宽四百米，占地总面积零点二八平方公里。建成后，时有飞机着陆，为军事侵略服务。

满航奉天管区桓仁出张所，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初首次开航，办理群众航空运输业务。每周定期通航三次（一、三、六）。由桓仁飞至奉天每张票价十七元，飞至通化每人票价为七元。信件和货物也以飞机输送，航空规模不大。成为我县航空史上第一页。

第一个水旱码头

——沙尖子商埠的兴衰

浑江发源于长白山脉，在我县境内流域五百余里，历史上曾为水上运输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每年冬至前后封江，翌年清明左右开江，由清明至立冬七个月为水上运输旺季。清末、民国初期，沿岸最大的商埠仅是沙尖子。运行船只为自制的“敞口、对子船、尖嘴帆船”，每年约制五百只。运出粮食三十五万石（每石合四百五十市斤），其他如麻绳、元皮、黄烟、元木等，共约计百万余斤。在无公路的情况下，水运是

县内唯一的运输渠道，价廉方便。

当年，沿江两岸多森林，春秋雨季，群众多砍伐木材在江内串成“木排”，乘江上涨水时放行，这种运输很合算。

水、陆运输，促进了沙尖子商埠的发展。沙尖子镇在县城东南九十里，位于上漏河口与浑江下游，前有江水环抱，后据城墙砬子，自北而南街长三华里。因江岸河口处有沙滩而得名。

在清末时期，沙尖子一带群众聚增，已建有小型集镇。自桓仁至沙尖子山道建成后，通化通火车之前，每到冬季，桓仁和道化地区所产粮食（主要是大豆），用马车和爬犁经横道川、影壁山运至沙尖子座囤，来年开江后装大船，运往安东。使沙尖子成为天然水旱商埠。自民国初至伪满初期，是沙尖子商业兴旺发达时期。工商业户最盛时为一百四十户，住户一千一百九十三户，居民八千八百三十五人。在工商业户中，最大的德泰兴烧锅有资金二万元；怡祥和商号每年囤积粮谷达一万余石。镇街两侧商业林立，经济繁荣。县内所产粮食和大宗农土产品百分之七、八十均于冬季运集该埠，日进铁车多达千台。春融解冻后，船只集中江边，最多时边五百余只。每年输出粮谷三十余万石，并由安东道运日用货和布匹销于县内各地，成为浑江岸上有名的水旱码头。群众称之为“小上海”，可见其繁华景象。

到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公路迅速发展，胶轮马车和汽车逐渐增多，公路运输能量增大；加上通化地区筑成铁路；特别是鸭绿江拉古哨修建水丰电站，迫使航运中断，导致商业倒闭，住户迁至他乡，集镇萧条，变为农业村庄。此为浑江水运与沙尖子商埠由兴至衰的过程。

建州女真在桓仁

王从安　邵文津

经查诸史料所载，明代女真共分三大部：一是建州女真，一是海西女真，一是野人女真。建州女真之名来源于建州设卫，建州卫设于明永乐元年（公元一四零三年），被明朝敕封，初任指挥使是阿哈出。当时的卫址曾在黑龙江、吉林省境内。公元一四二四年（明永乐二十二年）建州卫的第三代首领，阿哈出的孙子李满住率其所部为躲避鞑靼和野人女真的侵袭，移来婆猪江，即现在的浑江，李满住则住在兀剌山城南麓的瓮村。兀剌山城即现在我县的五女山城，其南麓的瓮村，便是水没前的长岗村。此地地势开阔，浑江两岸土质肥沃，山高林密，草木丛生，宜耕宜牧。该村址地势独特，背靠五女山城，面临环绕的浑江，四周群山环抱，背风向阳，风景宜人。特别是它地处浑江沿边的崖畔上，一面靠山，三面临水，地势颇佳，易守难攻。极适于女真人的居住习惯，也就是说，平时住于平原沃野，一有敌情则便住于山城。

其后，在一四三三年（明宣德八年）四月，朝鲜

藉口建州女真“入境劫杀军民”而分兵七路对建州发动了一次攻侵战争。攻击的矛头直指兀刺山城南麓的瓮村，李满住虽然退入兀刺山，但亦未免其难，战争中李满住被射伤而逃走，其之家小和部下人等近二百人被朝鲜军队所俘获或杀死。由于朝鲜军队的入侵，李满住在同年由兀刺山城南麓的瓮村迁到了兀刺山东北的兀弥府，修建城池，以避朝鲜的侵扰。关于兀弥府，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均认定就是我县拐磨子镇的东古城子村。从这个时候算起，到一四三八年的六月，李满住这五年时间一直住在兀弥府。这期间，李满住曾经联络居住在朝鲜会宁，为朝鲜把守北大门，并受明朝敕封以凡察为首领的建州左卫，来李满住处一起居住。当朝鲜得知明朝皇帝正式批准凡察迁回国内同李满住一起居住的消息后，就对李满住恨之入骨，势不两立。随于一四三七年九月分兵三路，对李满住又进行了一次大进攻，但未遭到大的损失。

《李朝实录》在记述兀弥府时有：“愁许山城在兀弥之西三、四里，路且隘险，才二人上下之地也。右处野人每当九月之季，收获已毕，则运粮于城挈家入保，以为过冬之计”。经实地考察，便是我县拐磨子镇小荒沟村西沟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小荒沟古遗址”所在。此处背江依山，陡峻如削，极难攀登。山城呈太师椅状，中间是较平坦的山洼，约为二千平方，背风朝阳，且极隐蔽，稍一设防则难攻入，是理想的防

战之地。近年不但在此山城拾的无数加沙陶片和瓦当、打制石器，而且拾到腐蚀很强的铁器。

经过一四三三年和一四三七年朝鲜两次攻侵，为躲避朝鲜掳掠，李满住遂于一四三八年(明正统三年)经明廷批准，由婆猪江移住浑河上游灶突山（即新宾县永陵前的烟囱山）。一四四〇年以凡察、董山为首的建州左卫，经明朝皇帝敕谕："……于三土河及婆猪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住"。(董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上五代祖。三土河即辉发河上游的三统河。冬古河即我县的六道河子）。李满住的移住灶突山，奠定了清朝统一全国的基础。

一四四二年（明正统七年），明朝皇帝为李满住又加封了官职，由指挥佥事升为都督佥事，仍由其职掌建州卫。李满住虽然迁到了灶突山，但婆猪江（浑江）流域仍然是他的势力范围。在他移住灶突山十三年之后，因畏惧蒙古兵马的侵袭，又由灶突山迁回婆猪江（我县）居住。

李满住于一四五一年回到婆猪江居住后，吸收了历史上的教训，一改过去敌祖朝鲜的策略，主动与朝鲜接近，表示友好，经常派他的子弟去朝鲜赠土物、送情报。当居住在建州某些女真部落去掳掠朝鲜，李满住怕殃及自己时，朝鲜则格外对其示意："必不并及"，让他不要惊慌。李满住正是因为这样，就丧失了对朝鲜的警惕性，终于在一四六七年九月明朝发动

的并命令朝鲜派兵配合，矛头主要针对在的征讨建州的“成化之役”中，上了大当。在“成化之役”前，也就是一四六七年的九月初；朝鲜接到明朝的敕书后，于九月二十六日即分兵两路，在主将康纯的统帅下，分别由满浦和高沙里(现今楚山附近之高山里)入攻婆猪江和兀弥府，李满住和其已经承袭了他都督职务的长子古纳哈等同被朝鲜军队杀死于婆猪江、兀弥府一带。此次战役中还有明朝主力军队分三路从另一个方向主攻建州左卫的虎城（新宾县二道河子附近）使建州女真所有积蓄荡然一空，建州三卫的首领均被杀死，从而元气大伤。直至过了十余年后才得复苏。

成化三年战役以后，直到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之前，我县范围内的浑江流域及富尔江、雅河、六河流域，仍然是满族居住的地方。一五八八年（明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攻克完颜城（我县北甸子乡王家堡子），杀死和收降了完颜部酋长李满住之后裔李大斗（岱度墨尔根）、李以南；同年居住在我县大雅河和六河流域栋鄂部首领的何和礼率精壮之兵马万余人归附于努尔哈赤，同时被努尔哈赤招为女婿。何和礼跟随努尔哈赤在征乌喇等战争中，破敌在前，累立战功，被封为正红旗总管。后于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称帝天命元年进封何和礼为五大臣之一。再后于浑河萨尔浒破明经略杨镐，以及下辽阳、攻沈阳何和礼率栋鄂部之精兵皆在行间，且战功赫赫，叙功，授三

等总兵官；富尔江流域到处都有女真部落。一五九五年，申忠一由朝鲜出使费阿拉（新宾县二道河子），路经建州时，在《建州纪程图记》中有着详载，所经我县北甸子乡（罗下）有"胡家五十余座"，酋长童尼求里，养有战马五十余匹。在拐磨子镇老黑背附近（夫都求）"有胡家二十余座"，酋长是童愁沙。在拐磨子镇的上甸子村（非乙汉坪）"有胡家十三座"，酋长是王忽可。在东古城子村（者未下）一带"有胡家二十余座"，酋长叫王骨赤等等。

建州女真迁来桓仁地区，距今已达五百六十余年，从历史上看，时间较早较长。而居住在桓仁的满族，对满清统一全国建立清朝，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五 女 山

邵文津

闻名中外的五女山，在《三国史记》、《魏书》、《大韩疆域考》、《明实录》、《辞海》、《奉天通志》、《中国名胜词典》中均有所载。沧桑变化，五女山曾名“五龙山”、《靰鞡山》、《五余山》、《纥升骨城》、《合罗城》。现为辽宁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女山，座落在桓仁镇东北七公里处，屹立在浑江右岸，主峰海拔八百二十四米，突兀雄伟，巍峨险峻，远远望去，酷似一座玲珑翠屏，每当云雾缭绕，又如一艘行驰在波涛中的彩船。这座稀奇俊秀的“翠屏”、“彩船”，呈长方体，四周皆为悬崖峭壁，南北长一千五百米，东西宽三百余米，高二百米。相传古有五女屯兵其上，因以为名。

五女山，形势险要，脉势悠然，北连长白山余脉的骆驼砬子，东北山麓为大东沟参茸场，西有刘家沟村，南有旧时军马粮草贮存地的金银库沟。由东北至西南，中有三道山梁，这三道山梁，如同保卫山城

的三道坚固防线，均延伸到浑江水库之畔。第一道梁由山城的西门下一公里处起，至当年整个浑江江道最为险要处的牤牛哨，尽头的石壁上凿有“观音哨”三个大字。此山梁蜿蜒起伏，陡峻的屏障，为五女山城天然形成的外城，现在旧时的军营、战垒遗址仍然存在。第二道山梁的尽头为“阎王鼻子”，旧有龙王祠一座，早年船工、木把每过牤牛哨前均至此祠祭奠，该祠早已倒塌无存。第三道山梁即由山城南门的西侧起直至长岗的末端，也就是五百多年前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所居住的瓮村，此梁中巨石崛起，周长百米余，高约三十余米，称小五女山。登其顶，东北之大东沟参茸场，马面石的峪口、正西之刘家沟村、三道山梁的首尾，以及西南的金银库沟和牤牛哨发电厂大坝均尽收眼底。若回首五女山绝顶之“集仙台”和山城内城的南门，亦是历历在目。因此，小五女山为当年五女山城的瞭望台。

五女山城共有东、南、西三门，而城内突兀石峰的四周均为悬崖峭壁，不可攀登。唯有西门称之为天门峰的隘口，可以登上顶峰。西隅的人行盘道，回旋三十二折，崎岖险阻，如同攀梯。行至盘道中途，怪石侧例，千态万状，愈走愈奇，有虎卧豹伏，熊蹲猿啼之势，欲跃欲搏，恶像狰狞，令人望而生畏。镇静细观，则又使你喜笑不止，妙趣横生。特别临近隘口时，若猛抬头左望，便会见到峭壁上插有“春秋刀”

一把，可是当你停步再细端详，却又不见踪影。这里两侧石壁对峙，极为狭窄，宽不过十米，自然形成城门，有“一夫挡关万夫莫过”之险要。进入城门，转向左侧，登上二层砬子，行不数步，便可见到一块石板下，伪满洲国时所测，用水泥制成刻有“一等水”三个字的标桩。由此回转，直向南行，地势宽阔平坦，土质肥沃，有耕土地数十亩。再前行三百米，旧有玉皇观正殿三楹，道士住宅厢房三间，每到夏季，庙院内荷苞、芍药花盛开，庙前李花怒放，馨香袭人。再前有泉水一泓，俗称天池，宽三米，长七米，深约一米，池水清澈见底，终年不涸不溢，色如乳汁，生饮清凉适口，烧开饮之，如品“龙井”。由天池西下，陡壁峭立，不敢俯视，攀树窥视，亦感头晕目眩，旁有石缝一道，宽约一米，深不见底，望去毛骨悚然。相传“五女山道士”，于此石缝中上下攀登，来去自如。石缝底部右侧有一石洞，俗称“狐仙洞”，宽五米，深三米，冬暖夏凉，洞底有水润出，终年不干。洞门前之草水初春先绿，为桓仁全境知春最早，深秋亦有鲜花盛开，枯落较晚。现今石缝中间竖有两节十余米长的水梯，扶梯而下，再猫腰蹲行五米多长的嵌石窟，亦可达洞前，游人每至此均摄影留念。由天池向南行，松柏楸槐、榆桦椴柞，林涛谡谡，百鸟飞鸣，悦耳动听。越过丛林，便是绝顶“集仙台”，亦称“点将台”，站在峰巅遥望浑江水库，

烟波浩渺，鱼船穿梭，如叶漂荡，汽艇驰过船尾跃越条条“银龙”。遇有风天，波浪起伏，有如万马奔腾；向西望去，发电厂厂区，桓仁镇全貌，似一幅幅画卷展现在眼前，好不壮观。放眼东北，参茸场的梅花鹿、繁殖场的东北细毛羊牧于山野，参园的参帘挂满坡前。那真是：“集仙台”前坐，耳边起松声。碧水观鱼跃，翠谷闻鹿鸣。满目尽画卷，置身在画中。夏季上午登临，有时江面云腾雾起，山上如披青纱，山水云天一体，人间仙境难辨，若是带上佳肴美酒，席地而坐，相互畅饮，如在天上传杯，云中谈笑，心旷神怡，别有情趣。正对西门的东隅，虽然无道，健壮之人攀树拽藤，如荡秋千，似坐滑梯，飞舞而下，可达山底。顺着盘山小路，经过一段坦途，便至山城东门和南门。山城略呈长方形，以“集仙台”绝壁下为起点，向东北延伸，城墙依山势高低，用三角块石砌成，总长一千余米，基宽五至六米，顶宽三至四米不等。现保存较好的一段城墙高度八米，蔚为可观。据书载，五女山城是公元前三十七年，（汉元帝建昭二年），朱蒙由北扶余逃至此山，修建城廓，建立高句丽国，是开国的第一都城。

绮丽壮观的五女山，为桓仁县“八景”之冠，人们并不满足于它的自然美，现在正于山巅修建“桓仁电视台”，一条龙摆尾式的盘山路，蜿蜒西上，汽车可直达山城外城；在陡峭的旧盘道处，铺设四百二十

延长来的斜坡卷扬，至此再上五女山，可乘汽车、小轨游览车直达山顶。山上，红砖青瓦的机房和宿舍掩映在绿树丛中，高入云表的电视发射塔即将竖起，灿烂的明灯，像一颗闪耀的夜明珠安在塔顶，给蔚兰的夜空增加一颗红色的新星，为富裕起来的桓仁人民福星高照。人们不禁唱道：奇峰赤壁耸立久，浑江碧波日夜流。五女九泉含笑慰，国强民富乐无忧。

编　　后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关于征集、研究、出版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等历史资料的规定，桓仁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决定出版《桓仁县文史资料》。它将为研究桓仁历史，教育后代，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

《桓仁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和大家见面了。从征集整理到编辑出版，得到了县各有关部门的热情帮助和各界知情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示敬意和感谢！

我们所征集和编印的稿件，多是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记述。但因经历及认识水平不同，其内容、观点及史实等，必有可商榷之处，欢迎知情者予以补充订正。同时，由于编者经历和知识有限，编印工作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县历史悠久，发生过许多次重大历史事件，需征集的史料内容丰富，范围广泛。我们将继续广征搏采，陆续编辑成册。热诚希望各界知情人士撰写稿件和提供线索，为推动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促进两个文明建设而共同努力。

文史资料编辑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